分类号：I207　　　　　　　　　　　　单位代码：10636

密　级：公开　　　　　　　　　　　　学　　号：20130206002

四川師範大學

硕士学位论文



中文论文题目：张骞传说研究

英文论文题目：The Study of Tales of ZhangQian

论文作者：邹　近

指导教师：段　渝

专业名称：中国古典文献学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所在学院：文学院

论文提交日期：2016 年 5 月 17 日

论文答辩日期：2016 年 5 月 28 日

学位论文出版授权书

本人完全同意《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出版章程》（以下简称"章程"），愿意将本人的硕士学位论文提交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全文发表。《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可以以电子、网络及其他数字媒体形式公开出版，并同意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在《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评价数据库》中使用和在互联网上传播，同意按"章程"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作者签名：邹匠

2016 年 6 月 15 日

论文题目：张骞传说研究

毕业院校：四川师范大学　　毕业年份：2016 年 6 月

所在学院：文学院　　所学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

说明：本授权书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保存。

联系电话：010-62791951 62793176 62790693　传真：010-62791814

通信地址：北京清华大学邮局 84-48 信箱　采编中心　邮编：100084

四川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学位论文 猴窝传说研究 ，是本人在导师 段渝 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本人承诺：已提交的学位论文电子版与论文纸本的内容一致。如因不符而引起的学术声誉上的损失由本人自负。

学位论文作者：邹近　　　　签字日期：2016年5月28日

张骞传说研究

中国古典文献学

研究生：邹近　　指导老师：段渝

摘要张骞作为“ 凿空 ”西域第一人，在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和影响。本文重点讨论古代所流传的关于张骞的种种传说故事，梳理其流变，结合时代背景解释其变化原因，最后总结一些传说故事构成的基本模式。

第一章张骞史实。从《史记》《汉书》等文献中勾勒张骞生平，并对其“ 博望侯 ”封号和冠名张骞的著作加以考证。再列举汉代人对张骞的评价。

第二章作为西域植物引入者的张骞传说。通过考辨各种附会于张骞的西域作物，认为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张骞引入过任何植物。总结出古书传抄讹误、地理名称的迁移联想、植物名的迁移联想、时代风气的影响、“ 博望侯 ”通名五个方面的附会原因。

第三章作为求法者的张骞传说。首先介绍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武帝时代西域的宗教信仰情况，证明张骞绝不可能去西域求经。然后将典籍中汉明求法故事列表论证里面张骞的名字是如何被更正的。但引敦煌壁画证明这个传说在一定时期内是有所流传的。最后解释成因。

第四章由“ 穷河源 ”所引出的张骞传说。梳理了张骞乘槎故事从魏晋到清代大致的流传及演变情况。分条论证了这个传说与其他故事的融合原因。

最后在结论中展现由对张骞传说的研究所总结出的古代传说故事流变的一些模式以及与时代的关系。

关键词：西域作物　求法　乘槎　叙事模式　时代背景

The Study of Tales of ZhangQian

Major: Chinese Classical Philology

Post Graduate：**Zou Jin**   Instructive Professor：**Duan Yu**

Abstract: ZhangQian is known as the first person of opening up the Western,having indelible achievements and impacts in history.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pread of various ancient tales about ZhangQian, carded their changes, combining historical backgrounds to explain their reasons for these changes. And finally, summed up some basic modes of the consisting of tales.

The first chapter is about ZhangQian's facts. Collecting life experiences of ZhangQian from literatures of “Historical Records” “History of Han Dynasty” and others.Explain the title of “Bo Wang Marquis” and writings. Then list the evaluation of ZhangQian from the people of Han Dynasty.

The second chapter is about the tales of ZhangQian as the introducer of Western plants. Discriminated the variety of Western plants which were attached by ZhangQian , that there is no conclusive evidence proves that ZhangQian introduced any plants. Then Summed up five reasons: incorrectness during the course of copying, migratory associ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migratory association of botanical names, the impact of age atmosphere, common name of “Bo Wang Marquis”.

The third Chapter is about the tales of ZhangQian as the Buddhism-classics obtainer. Introducing the time of Buddhism into China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era of Emperor Wudi proves that ZhangQiancouldn't go to the Western for Buddhism . Then testify that how it is corrected of name of ZhangQian by the sheet of writings about Buddhism-classics gain in era of Emperor Hanming. But wall paintings of Dunhuang proves the spread of this tale in a period of time. Finally, explain the causes.

The fourth chapter is about the tales of ZhangQian from “searching source of Huanghe River”. Carding the spread and changes of the “ZhangQian's boating”stores from eras of Weijin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And explain the reasons of integration of this tale with other stories.

Finally, to show some narrative modes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eras through the changeability of ancient tales from the study of ZhangQianstories.

Keywords: Western plants Buddhism-classics obtain Boating Narrative modes Historical backgrounds

目录

绪论

张骞因其作为“ 凿空 ”西域第一人而名垂青史。在他打通西域后所形成的丝绸之路成为了古代沟通亚欧大陆各国经济文化等交流的最重要途径。并且他对西域诸国的详细考察与报告，对汉朝制定经营西域基本方针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羁留匈奴十年, 历经千辛万苦而矢志不改的顽强意志也得到了后世非常高的评价。对于张骞的研究，目前学界大多集中在其出使路线、社会地位、功绩影响等历史学研究方面。而对于古代社会上所流传的各种张骞传说的研究，目前为止还不是很多。因此, 本文拟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 系统地梳理张骞的各种传说故事, 解释其形成原因。而本文更大的野心在于，试图以张骞传说为例，探讨古代传说故事的附会、演变形式、及兴衰因素。因此，我们认为通过对张骞传说的研究, 对于更好的理解古代传说故事的构成及演变是很有意义的。

近代以来，关于张骞的研究，大致分成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对西域历史的研究，这主要是百年前由西方的汉学家如伯希和、沙畹、斯坦因等所发起。其后国内的陈寅恪、陈垣、王静如、冯承钧等先生继踵而起，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西域历史地理风俗的研究成果, 而在研究汉魏时期西域情况这一块自然就涉及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研究，但其仅仅只是一个副产品，不算专门研究。第二个方向就是对张骞及其活动的历史史实、功绩评价、影响探讨、坟墓考古等方面的历史学作品，其最著名者便是日本学者桑原隲藏的名作《张骞西征考》。但是他们都是集中在史学范围内, 而对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各种张骞传说的专门研究几乎还没有涉及。八十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了一些张骞传说故事的本体研究。我们这里分类论述：一、考辨张骞的西域引种故事，最完整的是美国学者劳费尔的专著《中国伊朗编》的部分章节，其优势在于利用了比较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虽然有一些文献引用的错误，但大致勾勒出了中西植物交流的历史，其中就有对张骞传入物种的考辨。芮传明《葡萄与葡萄酒传入中国考》[①]，陈兴佳《石榴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②]，李平、孙杰、邢建军《论苜蓿的起源与传播》[③]等论文，非常多，不一一列举，但他们对待张骞传说是着重在农业史方面，而非文学研究。二、张骞的西行求法传说研究，梁启超、汤用彤、马伯乐等先生的相关著作都有涉及，但他们都是着力在探讨中国佛教的起源, 张骞传说并非其重点。孙修身的《从“ 张骞出使西域图 ”谈佛教的东渐》[④]、沙武田《角色转换与历史记忆_莫高窟第 323 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艺术史意义》[⑤]、张振新《谈莫高窟初唐壁画 “ 张骞出使西

[①]芮传明.葡萄与葡萄酒传入中国考[J].史林. 1991 年 03 期
[②]陈兴佳石榴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D].山东农业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4 年
[③]李平、孙杰、邢建军.论苜蓿的起源与传播[J].内蒙古草业.2012 年第 1 期
[④]孙修身.从“ 张骞出使西域 图 ”谈佛教的东渐[J].敦煌学辑刊.1981 年
[⑤]沙武田.角色转换与历史记忆——莫高窟第 323 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艺术史意义[J].敦煌研究.2014 年.第 1 期

域”》[1]都是对一幅关于张骞敦煌壁画的解读，但其文章主体基本上都还是在与史书记载对勘，涉及文学传说的地方不多。三、张骞乘槎传说研究，这一方面的论文就主要是文学研究领域了，邓绍基《典实和传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张骞》[2]，陶喻之《张骞乘槎故事源流考》[3]是从宏观上探寻张骞乘槎传说的流变；而陶喻之《“张骞泛槎”典故唐代接受史》[4]，李荣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张骞形象考述》[5]，周妍、任继昉《“张骞乘槎”典故研究》[6]，于洁《 宋元人心目中张骞形象及其历史渊源》[7]，孙琪《张骞典故的变迁与晚明文人眼中的传教士形象——以<熙朝崇正集>中艾儒略形象为例》[8]等则是分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张骞乘槎传说的一些变化。但是稍微遗憾的是，一来，这些论文都着重在其故事流变，很少解释它的形成原因；二来，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篇完整的详细论述张骞传说的论文。因此本文在这方面希望在前辈的基础上有所深入。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调查法。对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的收集并加以整理和提炼。先按类分，再以时间顺序铺排，构建张骞传说流变的历史轨迹。然后运用归纳法，从众多的故事中归纳出一些文学文本演变的常见规律，并针对各时期的形成因素及特点加以分析论证。

[1]张振新.谈莫高窟初唐壁画“张骞出使西域“ [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年第3期
[2]邓绍基.典实和传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张骞[J].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3]陶喻之.张骞乘槎故事源流考[J]. 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2期
[4]陶喻之.“张骞泛槎”典故唐代接受史[N].东方早报.2014年10月22日
[5]李荣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张骞形象考述[J]. 中华文化论坛. 2014年02期
[6]周妍、任继昉.“张骞乘槎”典故研究[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4年05期
[7]于洁.宋元人心目中张骞形象及其历史渊源[J]. 中原文化研究. 2014年01期
[8]孙琪.张骞典故的变迁与晚明文人眼中的传教士形象——以<熙朝崇正集>中艾儒略形象为例[J].文化论苑.2010年总第436期

1 张骞史实

本篇论文讨论的是历史上所流传的各种张骞传说故事，其中当然有大量的虚构成分。但是任何历史人物传说的产生与流变必定有着历史真实为依据或启发处。因此在探讨传说前，首先要对张骞的史实有所了解。

关于张骞的生平，最早，也是最具可靠性的记叙乃是司马迁的《史记》，张骞的政治生涯大约在前 139 年到前 114 或 115 年，司马迁为前 145 年-公元前 90 年左右，两者生活的时代差不多相同，因此有理由相信其记载的可靠性。但是司马迁只给了张骞一个附传，附于《史记 · 卫将军骠骑列传》之后：“ 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博望侯。后三岁，为将军，出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 ”[①]此生平介绍过于简短，没法给我们足够的信息。

1.1 张骞生平经历

关于张骞具体的人生经历，史公运用了其著名的“ 互见法 ”，散见于其他传记中。现在我们就从这些篇目中抽取出有关事迹，按时间排列：

建元二年（前 139 年）：出使西域

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②]

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前 139-129 年）：羁留匈奴十年左右

经匈奴，单于留之……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③]

元光六年（前 129 年）：到达大宛

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④]

元光六年至元朔元年之末（前 129-128 年）：留大夏一年多

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馀……[⑤]

元朔二年初至三年（前 127-126 年）：留匈奴一年多

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馀……[⑥]

元朔三年（前 126 年）：还朝

[①]【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44 页
[②]【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57 页
[③]【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57 页
[④]【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58 页
[⑤]【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58-3159 页
[⑥]【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59 页

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①]

元朔六年（前 123 年）：从军伐匈奴，封博望侯

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②]

元狩元年（前 122）：建议开西南道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 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 ”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③]

元狩二年夏（前 121 年）：援李广，贬庶人

其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皆击匈奴。郎中令将四千骑先至，博望侯将万骑在后至。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围郎中令，郎中令与战二日，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当斩，赎为庶人。[④]

元狩四年至元鼎二年（前 119-115 年）：出使乌孙

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言曰……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骞既至乌孙……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骞还到，拜为大行，列于九卿。[⑤]

元鼎三年（前 114 年）：调查王勃及其母

汉使者视宪王丧，棁自言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囚。天子遣大行骞验王后及问王勃，请逮勃所与奸诸证左，王又匿之。[⑥]

元鼎三年或四年（前 114 或 115 年）：卒

岁馀，卒。[①]王先谦曰：“《公卿表》：元鼎三年，骞为大行，三年卒。”施之勉证为：“ 是骞卒于元鼎四年也。 ”[②]王叔岷同。

[①]【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59 页
[②]【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29 页
[③]【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95-2996 页
[④]【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30-2931 页、第 2872-2873 页、第 2908-2909 页、第 3167 页皆有相似文辞
[⑤]【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68-3169 页
[⑥]【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102-2103 页

如果说司马迁是因为自身的历史观而对人物采用“互见”手法的话，那么其在东汉的后继者班固则是将太史公对于人物的叙述集中起来作传。《汉书》卷六十一有独立的《张骞传》，由于其篇幅较长，且张骞的真实史迹不是本论文的主要论证部分，这里就不赘述了。只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通过这两本史书记载的比勘，可以知道班固对于张骞，全是继承了《史记》的内容，并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材料，荀悦《汉纪》亦是如此。我们可以将张骞最重要的功绩史实简化为一个只有主谓宾成分的单句：张骞出使西域。在后几章的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如果将流传于后世的张骞传说简化成最为简朴的语言后，会发现这些故事传说都可以由这个单句变化而来，它们或者添加其他成分（如补结果），或者置换主要成分，或者在前面、后面添加成分使之成为表现面更广的故事，详细分析将在后面几章展开。

更为重要的是，从《史记》关于张骞的记载中，我们并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表明张骞直接带回了西域的物种，即后世所传大多皆为附会之词（详见第二章）；其次，对于佛教及佛法，我们甚至连间接资料都没有在《史记》中发现，来看出张骞与佛教东传有交集（详见第三章）；最后，《史记·大宛列传》正文没有明确说过张骞穷河源之语，而后世在这个的基础上不断的增加神话成分或与其他故事混杂，最终赋予了“张骞乘槎”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新奇的情节构造（详见第四章）。

1.2 释“博望侯”

关于“博望侯”这一称号的受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曰：“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③]，又《史记·大宛列传》曰：“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是岁元朔六年也。”[④]表明是因为其军功受封，时间是元朔六年，即公元前123年。

这次军功亦是与其出使西域的经历不可分的，司马贞《史记索隐》“案：张骞封号耳，非地名。小颜（颜师古）云‘取其能博广瞻望’也。寻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义也。”[⑤]旌表张骞对匈奴及西域之环境、风土的熟习所带来的行军功绩。

[①]【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169页
[②]王叔岷 著.《史记斠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319页
[③]【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929页
[④]【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167-3168页
[⑤]【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168页

关于张骞的封地，张守节《史记正义》注云“《地理志》南阳博望县。”[①]而为何会受封此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回到张骞的经历之中去，那就是他第一次的西行出使大宛，《史记 · 大宛列传》曰：“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②]可见武帝对于大宛之马的喜爱程度之深，且大有改良马种的现实意义。[③]而桓宽《盐铁论 · 西域篇》曰：“张骞言大宛之天马汗血”[④]，《汉书 · 西域传》亦曰：“宛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马汗血……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⑤]则可以推断，武帝眼中，张骞是与有善马的“大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关于“大宛”国之名，岑仲勉先生根据《史记》中“宛兵”“破宛”“宛大恐”等词出现达四五十次，与他国有很大差异，故认为“大宛”之“大”字，乃是因为汉使盛言夸虚宛国的广大富饶而添加于国名之前。[⑥]而中原地区，南阳古时也别名宛，是楚国的邑，《史记 · 秦本纪》“既虏百里傒，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傒亡秦走宛”下裴骃《集解》注曰“《地理志》南阳有宛县。”[⑦]从而我们可以推测，正是由于张骞与大宛的关系，朝廷才特意将同样有“宛”这一名的南阳郡下一块地方命名为博望侯国赐予张骞。而随着张骞被贬为庶人，博望侯国也改为了博望县。

后世，张骞以其“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⑧]，“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⑨]。“博望侯”一词便成为了汉代出使西域者的通称。其后我们将会看到成为了通名的“博望侯”可能将是造成后世把传说附会于张骞的重要因素之一。

1.3 张骞著作辨伪

《隋书 · 经籍志》有“《张骞出关志》一卷”[⑩]，《通志 · 艺文略》《玉海》《国史经籍志》记载同，《册府元龟》卷五六０“国史部 · 地理”则记作：“张骞为郎，使月氏，撰《出关记》一卷”[⑪]。

[①]【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68 页
[②]【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70 页
[③]余嘉锡.《汉武伐大宛为改良马政考》，《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75-180 页
[④]【汉】桓宽 撰，王利器 注解.《盐铁论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501 页
[⑤]【东汉】班固 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894-3895 页
[⑥]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86-287 页
[⑦]【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86 页
[⑧]【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59 页
[⑨]【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69 页
[⑩]【唐】魏徵等 撰.《隋书》. 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985 页
[⑪]【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年.第 6642 页

而对于古籍所引此书之文，有二则：《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五“百卉部”二引崔豹《古今注》曰：“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去实，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映彻可爱。实大如杯，味如豆寇，香美消酒。土人提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以其实消酒。其国人宝之，不传于中国。张骞大宛国得之，事在《张骞出关志》。”[①]《太平广记》等同。

宋代洪遵《泉志》卷十二曰：“《张骞出关志》曰：凡诸国币货，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币，率象国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则用国王之面，女人交易，则用王后之面，王死则更铸。”[②]明代胡我琨《钱通》同。

观《张骞出关志》此书，《汉书·艺文志》网罗当时天下之书，却无记载，则就大可怀疑了。梁启超说：“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久皆伪。”[③]清代叶昌炽有卓识：”西域图经，汉以前无闻，《隋书·经籍志》有《张骞出关志》一卷，疑好事者为之也。”[④]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着录已经到了隋代，与张骞时代过于遥远，又考虑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伪作之风以及《太平御览》所引的《古今注》本多虚妄之言。则大可断定此书为伪作。其次，我们从对“酒杯藤”形貌使用记载来看，似乎并不存在这种西域植物，张骞对西域乃实地考察，不会乱说。又观《泉志》所引这一条中的“凡诸国币货，多用蕉、越、犀、象”句，犀牛、大象是热带动物，可以生活在印度半岛和东南亚，但却不会生存于西域诸国，张骞之行最远到达大夏，大象不多，未及印度诸国。但看此书语气，似乎对外国货币是很有了解的。因此，从这一条我们也可以看出它可能作于对印度和东南亚有一定了解程度的南北朝时期或之后，而不出自张骞之手。

古代文献中又有《海外异记》一书，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下曰：“江南徐知谔为润州节度使温之少子也。美姿度，喜畜奇玩……又得画牛一轴。昼则啮草栏外，夜则归卧栏中。谔献后主煜，煜持贡阙下。太宗张后苑以示群臣，俱无知者。惟僧录赞宁曰：‘南倭海水或减，则滩碛微露。倭人拾方诸蚌，胎中有余泪数滴者，得之和色着物，则昼隐而夜显。沃焦山时或风挠飘击，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则昼显而夜晦。’诸学士皆以为无稽，宁曰：‘见张骞《海外异记》。’后杜镐检《三馆书目》。果见于六朝旧本书中载之。”[⑤]明代陈懋学的著作《事言要玄》也为相同记载，只是名称为《海外异物记》，应该是《湘山野录》津逮秘书本脱一“物”字[⑥]。观此条内容，全为东南海域故

[①]【宋】李昉等 编.《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404页
[②]【宋】洪遵 撰.《泉志》卷十二. 明万历刻秘册汇函本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④]【清】叶昌炽 著.《奇觚庼文集》卷上.民国十年刻本
[⑤]【宋】文莹 撰，郑世刚 杨立扬 点校.《湘山野录 续录 玉壶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7页
[⑥]【日】桑原隲藏 著，杨炼 译.《张骞西征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47，117页

事，与张骞经历绝无干涉，且故事如张华《博物志》鲛人传说等类似，故可以推断此书与《张骞出关志》一样，乃托名之伪作。

德国汉学家 Herrmann 教授认为《史记 · 大宛列传》中讲述西域诸国事物的前半部分是根据的张骞归朝后的报告，并且辩驳了班固于《汉书 · 张骞传》中“ 语皆在《西域传》 ”的错误之处[1]。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看法，因为作为一个大范围地区介绍之文的《大宛列传》在最开始部分几乎可以认为是张骞的个人不完整传记。而接着又有多处“ 骞曰 ”“ 具为天子言之 ”“ 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 ”等语言，则说《大宛列传》前半部来源于张骞的讲述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1.4 张骞在汉代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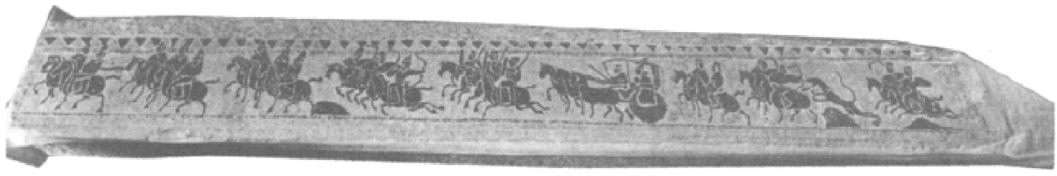
汉代朝廷对张骞就有着很高的评价。《史记 ·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曰：“ 知水道，及前使使绝域大夏功侯。 ”[2]，《汉书 · 叙传下》曰：“ 博望杖节，收功大夏。 ”[3]充分肯定了张骞筚路蓝缕的凿空功劳。并且，汉代人对凿空的影响是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和判断的，《汉书 · 郑吉传》曰：“ 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4]郑吉是西汉汉宣帝时期将领，屯田西域，破车师，迎降匈奴日逐王，建乌垒城，成为第一个西域都护，镇抚各国。班固等人认为汉代能够设置西域都护府，将西域纳入汉廷统治之下的局面，张骞有着莫大的开创之功，因此《汉书 · 段会宗传》后赞曰：“ 自元狩之际，张骞始通西域，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讫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然其有功迹者具此。 ”[5]《后汉书 · 西域传》也论曰：“ 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 ”[6]

张骞还成为了一些士人的理想人生楷模，班超青年时即投笔叹曰：“ 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7]对于张骞即使陷于绝境，也仍然不失节的血气表达了由衷的钦佩：“ 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 ”[8]

70 年代，南阳市宛城区辛店乡熊营村出土了一块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的汉砖，上有画像，如下：

---

[1]转引自【日】桑原隲藏 著，杨炼 译.《张骞西征考》.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115 页
[2]【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038 页
[3]【东汉】班固 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4256 页
[4]【东汉】班固 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306 页
[5]【东汉】班固 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032 页
[6]【南朝宋】范晔 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31 页
[7]【南朝宋】范晔 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571 页
[8]【南朝宋】范晔 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575 页



“ 张骞通西域 ” 汉砖[①]

此汉砖虽然并未有字样，但是考虑到出土地即是古代张骞受封的博望侯国或其附近之处，我们大致可以推定此画像即是讲诉的是张骞通西域的故事。[②]这件文物的出土，形象地展现博望侯对于中西方沟通的重要历史意义。

①转引自袁祖雨.《“ 张骞通西域 ” 汉代画像石考辩》，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2 卷第 7 期 2013 年 7 月.第 22 页
②对画像的描述参见《“ 张骞通西域 ” 汉代画像石考辩》第 23-26 页

2 作为西域植物引进者的张骞传说

不同地区之间农业作物等的传播是文明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节, 它不仅促进了物产的增加和多样性发展, 同时也是不同文化间交流与融合的纽带。

在古代典籍里, 第一个有意引进植物物种的人物便是张骞。这种传说记载从晋代张华《博物志》一直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 甚至直到近代绵延不绝。然而吊诡的是, 我们恰恰在最具真实可靠性的著作《史记》和《汉书》中却找不到明确的关于张骞引进物种的记载。那么典籍中众多西域植物入华的传说是如何与张骞相联系, 而这种附会其背后有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以及心理因素, 这就是本章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2.1 文献所涉张骞传入植物考辨

苜蓿

关于苜蓿这种植物, 我们都知道它是饲养马匹不可多得的优质草料。“ 苜蓿 ” 二字非此种植物名最初的写法, 《汉书 · 西域传》写作“ 目宿 ”[①], 两字没有草字头, 音韵学上二字, 高本汉拟作“ mi ̯ʊk-si̯ʊg ”, 王力拟作“ miuk-siu ”, 而日语为“ moku-suku ”, 说明它起初是一个音译名词。而后来才增加了它的物种属性, 加上了草字头, 也有古书因为它的饲料功用, 写作“ 牧蓿 ”“ 谓其宿根自生可饲牧牛马也。 ”[②]

汉代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张骞传入苜蓿, 时代最早的《史记 · 大宛列传》曰 :“ 俗嗜酒, 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 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 外国使来众, 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 ”[③]所用词是“ 汉使 ” 而非张骞。而《汉书 · 西域传》袭用太史公语且说得更为明确 :“ 于是天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 连四年……宛王蝉封与汉约, 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 又外国使来众, 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 ”[④]这里确凿地记载了苜蓿和葡萄是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李广利破大宛后与宛人约盟后取回中原的, 此时张骞早已逝世多年。再以张骞的经历, 从大宛归国时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 在这种情况想要带物种归朝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最早将苜蓿的引入归到张骞名下的是西晋张华,《北户录》卷三引《博物志》曰 :“ 张骞使西域, 还, 得大蒜、安石榴、胡桃、蒲桃、沙葱、苜蓿、胡荽、黄

[①]【东汉】班固 撰.《汉书》.北京 : 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885, 3894-3895 页
[②]【清】吴玉搢着.《别雅》卷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 : 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73-3174 页
[④]【东汉】班固撰.《汉书》.北京 : 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895 页

蓝。”[①]《史记》中只能找出苜蓿和葡萄两种，而张华排比了如此多的植物都归于张骞，显然是一股脑地附会上去的。而当时又有苜蓿园的说法，传为东晋葛洪所集汉魏佚史的《西京杂记》曰：“乐游苑自生玫瑰树，玫瑰树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为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②]唐慎微《证类本草》引陶弘景语曰：“长安中乃有苜蓿园。北人甚重此，江南人不甚食之，以无味故也。”[③]梁刘昭注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长乐廏丞一人”下曰：“《汉官》曰：员吏十五人，卒驺二十人，苜蓿菀官田所一人守之。”[④]可知苜蓿汉代以来即于皇家园林有种植且有专人守卫。《晋书·华廙传》曰：“帝后又登陵云台，望见廙苜蓿园，阡陌甚整，依然感旧。”[⑤]则表明魏晋时期京城地区部分上层人士有也会营造专门栽种苜蓿的苑囿。到了南北朝时期，于是就有了张骞造苜蓿园的传说了，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张骞苜蓿园，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也，张骞始于西戎得之。”[⑥]而之前的史料中绝无此种记载，再考虑到《述异记》的小说性质，断定此为杜撰之语就是没有问题的了。自此以后，张骞引进苜蓿的传说深入后世，如宋代的学者陈景沂《全芳备祖》曰：“大宛马嗜苜蓿，汉使张骞因采葡萄、苜蓿归种。”[⑦]在《史记》和《汉书》中“汉使”后加入“张骞”二字。李时珍《本草纲目》曰：“苜蓿原出大宛，汉使张骞带归中国。然今处处田野有之。年年自生。”[⑧]可证明这种传说在后来的根深蒂固。

葡萄

葡萄在《史记》《汉书》等中作“蒲陶”，而在另外一些早期著作如《三国志》《西京杂记》《邺中记》等中作“蒲桃”，“葡萄”的写法在同一时期也大量出现，《汉纪》《三辅黄图》《三辅决录》中都有出现。还有“葡桃”等，不一而足。美国汉学家劳费尔认为，葡萄古音为 bu-daw。大宛语是古代伊朗语的一个分支，伊朗语中葡萄叫做 budawa，因此葡萄一词也和苜蓿一样，肯定是大宛来的音译词。[⑨]虽然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有“樱桃蒲陶”句，但有学者认为这个“蒲陶”是中原地区本土的野葡萄而非后来西域传来的品质优良，后来广泛栽种的葡萄品种。

---

① 【唐】段公路纂.《北户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46 页
② 旧题刘歆撰.《西京杂记》.《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80 页
③ 【宋】唐慎微撰.《证类本草》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十七.四部丛刊景金泰和晦明轩本
④ 【南朝宋】范晔 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581 页
⑤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 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261 页
⑥ 【南朝梁】任昉撰.《述异记》卷下.明汉魏丛书本
⑦ 【宋】陈景沂编.《全芳备祖》后集卷二十六“蔬部”.明毛氏汲古阁钞本
⑧ 【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点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 年.第 1652 页
⑨ 【美】劳费尔着，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49-50 页

上面“ 苜蓿 ”条中我们已经顺便证明了葡萄是由李广利破大宛国后所携种回国的。但是北朝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却说：“ 蒲萄，汉武帝使张骞至大宛，取蒲萄实，于离宫别馆旁尽种之。 ”[①]与上面“ 苜蓿 ”条所引《史记 · 大宛列传》和《汉书 · 西域传》的记载对勘，可以说《齐民要术》这段即是两本史书相关段落的节本，但是此时“ 汉使 ”已经明确地成为了张骞了，这种说法一直有延续，如《本草纲目》曰：“ 《汉书》言：张骞使西域，还，始得此种。 ”[②]更是将张骞引入葡萄的传说直接说来自正史了。而明代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连引入的品种都有叙述：“ 蒲桃出于大宛，张骞所致有黄白黑三种。 ”[③]

石榴

石榴在古代也被称为丹若、安石榴、涂林、若榴等。文献中最早记载这种植物的是张衡《南都赋》：“ 樗枣若榴 ”，而《史记》《汉书》没有提到过，说明石榴应该是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本草纲目》引张华《博物志》曰：“ 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 ”[④]陆机《与弟云书》曰：“ 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安石榴也。 ”[⑤]则可知“ 安石 ”乃西域国家名，劳费尔还是用了历史语言学来证明，“ 安石 ”古音 an-sek 或 an-sak，符合安息帝国 Arsak 的读音。[⑥]

从上面所引的张华和陆机两人的记叙，表明在魏晋时期，张骞传入石榴是社会上比较广泛的说法。而这种传说为后代所袭用，如唐代封演《封氏闻见录》曰：“ 汉代张骞自西域得石榴、苜蓿之种，今海内遍有之。 ”[⑦]唐代李冗《独异志》曰：“ 汉张骞奉使大月氏，往返一亿三万里，得葡萄、涂林、安石榴，植之于中国。 ”[⑧]《事物纪原》、明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等都有所记载，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

胡桃

胡桃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核桃，“ 胡 ”字表明其来自异域地区。最早记录胡桃的是《东观汉记》：“ 后汉有……胡桃宫 ”[⑨]，《金匮要略》也有记载：“ 胡

[①]【北魏】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年.第 273 页
[②]【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点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 年.第 1884 页
[③]【明】慎懋官撰.《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 花木考 ”卷五.明万历九年刻本
[④]【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点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 年.第 1782 页
[⑤]【晋】陆机.《陆机集》.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79 页
[⑥]【美】劳费尔着，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110 页
[⑦]【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66 页
[⑧]【唐】李冗撰.《独异志》.《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934 页
[⑨]【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922 页

桃不可多食，令人动疾饮。”[①]说明胡桃引进中国的时间是东汉时期。《艺文类聚》引晋刘滔母《答吴国书》曰：“胡桃本生西羌。”[②]《证类本草》引苏颂《图经本草》曰：“此果本出羌胡。”[③]而陈淏子《花镜》更是记载了胡桃的另外一名“胡桃，一名羌桃。”[④]从这些农业种植有关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实地考察来说胡桃应该是原产于西羌地区，而王明珂《华夏边缘》中认为东汉时期，羌的地理概念应该集中在现在的整个大青藏高原地区[⑤]。因此胡桃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与张骞没有关系。

而张华《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安石榴、胡桃、蒲桃、沙葱、苜蓿、胡荽、黄蓝。”[⑥]把胡桃引进归于张骞，后代也继承了这种说法，并还点明了种植栽培的地点和影响，如《本草纲目》引苏颂语：“此果本出羌胡。汉时张骞使西域，始得种还，植之秦中，渐及东土，故名之。”[⑦]

关于胡桃，《西京杂记》“上林名果异木”条记载上林苑有“胡桃”小注“出西域”[⑧]。这里我们有一个设想，就是上林苑里有葡萄宫种植葡萄，后来有有胡桃树，而当时传说张骞引进西域葡萄，而胡桃时人亦认为其出西部，故将胡桃附会于张骞也就存在很大可能性了。

胡荽

胡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香菜，或曰芫荽。《博物志》也将胡荽归于张骞，《本草纲目》引陆机疏“卷耳”曰：“其叶青白似胡荽”[⑨]，从这两则最早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中原地区的人认识胡荽的时间大致是东汉至魏晋时期，非张骞传入。而李时珍则在《本草纲目》“胡荽”下注曰“张骞使西域，始得种归，故名胡荽，今俗呼为蒝荽。”[⑩]又引唐代陈藏器的说法：“石勒讳胡，故并汾人呼胡荽为香荽。”[11]与上文所引文字比照，就知道这句话是整合了张华与苏颂等人的说法而来，或许是李时珍因为其“胡”这个字与张华的说法，便不加考证地将其注释到张骞名下。

[①]【东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新编金匮要略方论》.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95页

[②]【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90页

[③]【宋】唐慎微撰.《证类本草》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十七.四部丛刊景金泰和晦明轩本

[④]【清】陈淏子撰.《花镜》卷三清刻本

[⑤]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244页

[⑥]【唐】段公路纂.《北户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6页

[⑦]【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点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第1803页

[⑧]旧题刘歆撰.《西京杂记》.《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3页

[⑨]【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点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第990页

[⑩]【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点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第1630页

[11]【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点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第1630页

大蒜

大蒜古代也称胡蒜，将其归于张骞传入也先是《博物志》的说法，后贾思勰《齐名要术》引东汉后期崔寔曰：“ 八月，可种大蒜。 ”[①]又注有“ 王逸曰：张骞周流絶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得大蒜、胡荽。延笃曰：张骞大宛之蒜。潘尼曰：西域之蒜。 ”[②]则知从东汉开始大蒜即被广泛种植，且知道它是来自于西域，故附会于“ 凿空 ”的张骞名下。

胡麻

最早出现这个植物名称的典籍是《博物志》和《齐名要术》，但都没有说明来历。东晋时期的《灵宝五符经》曰：“ 胡麻本生大宛生。 ”[③]《本草纲目》李时珍解曰：“ 按沈存中《笔谈》云：胡麻即今油麻，更无他说。古者中国止有大麻，其实为蕡，汉使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来，故名胡麻，以别中国大麻也。 ”[④]郑樵《通志》曰：“ 胡麻……本出大宛，张骞传来，故名胡麻。 ”[⑤]综合以上所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胡麻来自大宛，自然就被附会到张骞身上，附会时间可能出现在宋代。

胡瓜

“ 胡瓜 ”一名首先出现在《齐名要术》，后世亦未见其出于谁的引进，到了李时珍则说：“ 藏器曰：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瓜，至今因之。时珍曰：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按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为黄。与陈氏之说微异。 ”[⑥]而前面引过唐代陈藏器“ 胡荽 ”之“ 胡 ”来自避石勒讳的说法，想来是李时珍由此迁移到胡瓜上，说成了胡瓜也是由张骞引入。

红蓝

红蓝即是胭脂，古代也名燕支。《博物志》中称张骞所得的“ 黄蓝 ”。同样是晋代的崔豹于《古今注》中说：“ 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亦谓为红蓝，以染粉为妇人色，谓为燕支粉。 ”[⑦]只是说来自西域，并未点明张骞。但是这种说法本身就已经是不准确的，《史记》当中所记载霍去病破匈奴取得祁连山一事《索隐》曰：“ 匈奴失二山，乃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⑧]东晋习凿齿也说：。

[①]【北魏】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年.第 192 页
[②]【北魏】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年.第 191 页
[③]【南北朝】佚名.《灵宝五符经》卷中.明正统道藏本
[④]【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点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 年.第 1435 页
[⑤]【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第 2010 页
[⑥]【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点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 年.第 1701 页
[⑦]【晋】崔豹撰.《古今注》.《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46 页
[⑧]【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09 页

“ 山下有红蓝……北方人探取其花染绯黄，采取其上英鲜者作燕支，妇人将用为颜色。 ”[①]从以上所引我们可知红蓝乃是匈奴妇女常用的化妆品，按照匈奴与中原地区的交往程度，我们可以推测中原人士应该早就知道胭脂，而其引进可能就是在霍去病攻破匈奴的同时带回来的。当然此时张骞也是攻匈奴的主要将领之一，由他引入也是有可能的，只是在张华之前找不到确切的说法。最开始说胭脂来自燕支山，崔豹则扩大地理范围说来自“ 西方 ”，而《博物志》则将“ 西方 ”二字转为“ 西域 ”，而张骞出使西域的史实太深入人心，我们可以推断，正是这样一层层的地理称呼的转变，而使张骞引进红蓝的说法流传开来，如《本草纲目》曰：“《志》曰：红蓝花即红花也，生梁汉及西域。《博物志》云：张骞得种子西域，今魏地亦种之，颂曰：今处处有之。 ”[②]

菠菜

在所有附会张骞传入植物的传说中，起源最晚的是菠菜。最早记录者来自《太平广记》卷四百一十一“ 草木六 ”曰：“ 菜之菠薐者，本西国中，有僧自彼将其子来，如苜蓿、蒲萄因张骞而至也。菠薐本是颇陵国将来语讹耳，多不知也。出《嘉话录》。 ”[③]而《嘉话录》是唐代韦绚的作品，说明唐代人是知道菠菜是由和尚从西方带来，而此句中的张骞只是作者将西域僧人带来菠菜种子的事迹比拟流传的张骞带回苜蓿、葡萄传说。而到了宋代的郑樵，《通志》曰：“ 菠薐菜，本出颇陵国。张骞带来，语讹为菠。 ”[④]就张冠李戴，将流传下来的与韦绚记载相似的句子省略、讹误成了张骞传入菠菜。

2.2 张骞引进西域植物传说成因

在第一节里我们已经对一些说法最早或重要的古代典籍中有关张骞引入西域植物的传说有了大略的考辨，可以看到对于这些传说，套入第一章所提出的核心句式“ 张骞出使西域。”中，就是补充一个结果“ 张骞出使西域[有 XX 成果] ”，而这一节我们将对这些传说故事的附会成因做一个分类叙述。

2.2.1 古书传抄讹误

古代的典籍在传抄过程中，由于没有严密的引用定则，常出现省写、缩略、添笔等现象或多种相似内容的混杂抄写，吊诡的是这种传抄讹误本身却成为了一种构建历史传说的重要方式，正如学者田晓菲所言“ 在抄本时代，一个抄写者作

[①]【唐】段公路纂.《北户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45 页
[②]【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点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 年.第 966 页
[③]【宋】李昉 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344 页
[④]【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第 2010 页

为一个特别的读者，可以积极主动、充满自信地参与文本的再创造……这些人以其抄写、编辑、改动、修饰、补缺等种种活动，参与了手抄本的创造。”[①]下面我们就以葡萄为例，具体来看看这种形式的形成过程。现在将各个古籍中的记载各用一句简化句式来表述：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简化句：

汉使于大宛取/采葡萄实/种，于离宫别馆旁种。

《博物志》简化句：

张骞使西域，还，得葡萄。

《齐民要术》简化句：

（汉武帝使）张骞出使大宛，取葡萄实，于离宫别馆旁种。

《本草纲目》：

（《汉书》言：）张骞使西域，还，始得此种。

这样将这四种重要古籍相关内容的句式一排比，其演变就非常明显了，在《史记》《汉书》的人物是通名的“汉使”，地点大宛。《齐民要术》是在抄写史书的时候将“汉使”置换为了“张骞”，说明贾思勰的时代的人相信张骞引入葡萄种的故事，比如《博物志》的说法，而在编写本书时直接挑明张骞这个具体人物。张华可能是为了排比众多的作物而将地点改成了范围比“大宛”大的“西域”，而到后世的古籍比如《本草纲目》等都直接说张骞使西域得葡萄种的传说是来自正史了，可以说这也成了一种“历史的构建”。第一节中所考辨的葡萄、胡桃、菠菜等都有这样的变化形式来形成传说，这里就不一一论证了。

2.2.2 地理名称的迁移联想

在张骞的这种传说中，主要有三种联想方式。

第一种是地理范围的扩大与转移。比如红蓝：

燕支山→西方、北方→西域

（《史记》）（崔豹、习凿齿）（张华）

由于张骞出使西域的事迹广为流传，破匈奴得燕支山又与张骞有关，自然传说就演变为了“张骞出使西域，得红蓝种，种之于汉地。”的传说。

其次看看大蒜：

大宛→绝域　/　西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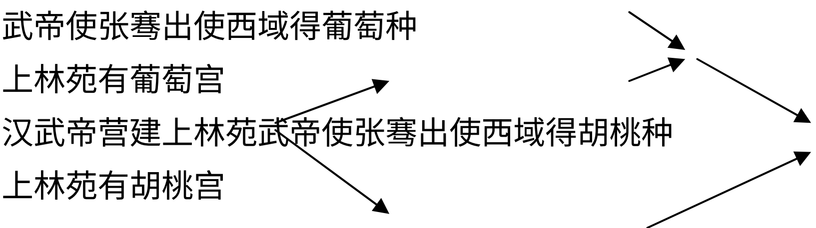
（延笃）（王逸）（张华、潘尼）

[①]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页

其故事形成的思维方式也同上。

第二种是地名与人物张骞有莫大关系者引出的联想，如胡麻，至少从东晋开始，人们就知道胡麻来自大宛，而由于张骞与大宛国密不可分的历史关系，就出现了这种凡是传说来自大宛的作物，必然附会到说是张骞带回来的，胡麻、大蒜、苜蓿、葡萄等莫不如此。

如果说第二种是由地名与人物的关系引出的话，第三种便是地名与地名之间的迁移联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胡桃。我们知道汉武帝大兴土木，建造了上林苑，并且将大宛的葡萄种引入也是他在位期间，而上林苑中又有葡萄宫，虽然无法确定它在什么时候建造的，但不会晚于汉哀帝时期，《汉书 · 匈奴传》曰：“ 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 ”[①]《三辅黄图》也曰：“ 葡萄宫在上林苑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以太岁厌胜所，舍之此宫也。 ”[②]鉴于武帝征服南越建造扶荔宫的例子，很有可能葡萄宫也是武帝时所建。而东汉又有胡桃宫，《东观汉记》曰：“ 后汉有……胡桃宫。 ”[③]《后汉书 · 南匈奴列传》有：“ 顺帝幸胡桃宫临观之 ”[④]句。因此根据史实与传说材料，我们便可以做出如下推断：



以上的图示，就是为了说明，根据古籍记载，很可能是由于葡萄宫与胡桃宫都在上林苑，葡萄与张骞有关，进而附会说胡桃的引进也与张骞有涉。

2.2.3　植物名的迁移联想

“ 胡 ”字是古代汉人对于北方和西方游牧民族的称呼，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共名。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了胡蒜、胡麻等来自大宛或者说西域，它们都带有“ 胡 ”字表明其是外来作物，而正是这种带“ 胡 ”字的模糊称谓，使得传说附会成为可能。如我们前面考辨的“ 胡荽 ”“ 胡瓜 ”，李时珍由唐代陈藏器关于石勒将带有“ 胡 ”字的作物换名的传说认为胡荽、胡瓜之“ 胡 ”就是胡人之“ 胡 ”义，又根据前人关于胡蒜、胡麻等的说法，不加考证地得出其他带“ 胡 ”字的作物也就是张骞出使西域所带回来的。

[①]【东汉】班固 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817 页
[②]【汉魏】佚名，【清】毕沅校正.《三辅黄图》.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24 页
[③]【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922 页
[④]【南朝宋】范晔 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63 页

2.2.4 时代风气的影响

自从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而首要的交流必定是物质上的，农业社会重要交往点必然是农作物的栽培和移植，但一方面，以汉魏时期的农业技术水平和作物普及价值上的差异，许多作物不可能短时间内遍植，依然是传言中的异域稀有之物；另一方面，人们都有一种探究事物来历的好奇心理，总有想要让各种事物有各得其所的来源故事用于生活谈资，尤其是当时的文人，大部分都有收集异域奇闻怪谈以显示自己博文广识的癖好，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对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批评中点明了其特点：“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册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①]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也评论到：“其中未尝无好学者，然所学亦正以供谈资。”[②]因此，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魏晋时期附会玄奇之风大盛，如将作物归于张骞最多者张华，就是一个喜好收集杂说野史的人，同时代的王嘉于其《拾遗记》中就说他：“挺生聪慧之德,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③]鲁迅也评价到：“华既通图纬,又多览方枝书,能识灾祥异物,故有博物洽闻之称,然亦遂多附会之说。”[④]

其次，魏晋时期又是玄风盛行，道家思想流传非常深广的时代，而这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使得时人更加关注于与外在物的关系, 陈寅恪先生一语中的：“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而尚能注意人与物之关系，较之佛教，实为近于常识人情之宗教。”[⑤]而将西域传入的植物附会于“凿空”的张骞则就是这种确定事物起源与我们自身和它们关系的“便捷”且易于接受的说法。

2.2.5 “博望侯”成为通名

第五点仅仅是一种推测。从第一节的考辨中，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附会到张骞的植物都是西汉中后期到东汉这一时段传入的。张骞被封为博望侯，但这个称号在后来一段时间内似乎成了出使者常用以自称的通名, 因张骞以其“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⑥]，“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①]，自称

[①]【唐】刘知几 撰，【清】浦起龙 通释，王煦华 整理.《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15-116 页
[②]【清】赵翼 撰，王树民 校证 .《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168 页
[③]【晋】王嘉 撰.《拾遗记》.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554 页
[④]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40 页
[⑤]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集.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 36 页
[⑥]【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59 页

为博望侯能够更顺利地与西域各国人士交往。并且《汉书·张骞传》有记载："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牦靬、条支、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②]张骞之后，朝廷源源不断地向西派出使者，且最远应该到达过安息、条支。而上文我们已经证明了石榴来自于安息。因此结合作为通名的"博望侯"，也许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后来这些使者引入了一些西域作物，他们很多时候又私称为博望侯，而博望侯名号众人皆知归于张骞，故之后就有各种作物是由张骞引入的这种传说的广为流传。

总之，经过本章对张骞传入各种植物的考辨我们知道了没有找到任何一种作物是能够确定由张骞带回的，当然即使是真有，也就大概一二种，没有古籍上记载的那么多。再者，我们通过古书传抄讹误、地理名称的迁移联想、植物名的迁移联想、时代风气的影响、"博望侯"通名这五个方面探讨了这种附会传说的成因。

[①]【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169页
[②]【东汉】班固 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694页

3 作为佛经传入者的张骞传说

张骞通西域的史实本来与佛教的传入中原没有干涉，但是到了汉魏时期，却突然有了张骞出使西域引入佛教的传说流传开来。本章即是梳理这个传说的起源与流传，挖缺这种附会传说的成因。

3.1 汉代佛教背景

在论述张骞引入佛教的传说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要对佛教何时传入中国以及西汉前期、中期西域的宗教信仰有一个梳理和了解，这将是后面两节论证的先决条件。

3.1.1 佛教传入中国时间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的，近代以来有梁启超、汤用彤、季羡林以及外国汉学家马伯乐、沙畹、许理和等多位大家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因此我们这里就糅合他们的论证简要叙述一下。

国人知道佛教时间，南朝宋宗炳《明佛论》说伯益时，《周书异记》说周昭王、周穆王时，《弘明集 · 后序》说孔子时，东晋王嘉《拾遗记》说燕昭王时，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说秦始皇时。[①]以上所列之书都是后世作伪之作或附会之词，其叙述荒诞不经，一眼便知是依照汉魏时关于佛教的记载杜撰出来的，所以这里不做过多叙述。

其次，我们这里再来看看汉代的前期和中期是否中原地区就已经知道有佛教存在。公元三世纪抄掇杂书而成的《三辅故事》中记载：

> 武帝初，穿池，得黑土，帝问东方朔。朔曰：“ 西域胡人知之。 ”乃问胡人。胡人曰：“ 劫烧之余灰也。 ”[②]

并未点出胡人名字，且里面的佛教色彩还很淡。而《汉书 · 东方朔传》赞曰：“ 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 ”[③]说明这种东方朔故事基本上都是后世好事者虚构出来的。

到了干宝的《搜神记》中则佛教色彩加以明显：

[①]汤用彤 著.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3-7 页
[②]【魏晋】佚名 撰.《三辅故事》. 龙谿精舍丛书.第 151 页
[③]【东汉】班固 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873 页

汉武帝凿昆明池，极深，悉是灰墨，无复土。举朝不解。以问东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曰："试问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难以移问。至后汉明帝时，西域道人入来洛阳，时有忆方朔言者，乃试以武帝时灰墨问之。道人云："《经》云：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此劫烧之余也。"乃知朔言有旨。[①]

这里人物具体到了说是西域来的得道之人。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出现了"汉明帝时"，则我们可以肯定干宝时期"汉明求法"的故事是广为流传的。

而再到南朝梁慧皎撰的《高僧传 · 竺法兰传》则曰：

又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问东方朔，朔云："不委，可问西域人。"后竺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朔言有征，信者甚众。[②]

名字也具体为了竺法兰。但是关于竺法兰，近代以来梁启超、汤用彤、陈寅恪等众多大家都证明了"后汉竺法兰本无其人，实因此东晋昙无兰而传会之耳。梵文名本同也。"[③]

从以上所引三段文字,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隐含着佛教义理故事的构建附会过程，从而可以推测《三辅故事》不能够成为武帝时期已有佛教传入的证据。

再次来说休屠王金人的问题。《史记 · 匈奴列传》曰："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馀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馀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④]关于这个"金人"，汤用彤先生根据历代《史记》《汉书》的注疏, 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金人"是匈奴的传统祭天信仰, 而非佛教, 至于将其误解为涂金佛像是从三国时期的张晏开始的[⑤]。而现代台湾学者谢剑运用民族人类学方法和出土的北亚时刻萨满鼓等考古资料证明了古代匈奴的信仰和仪式[⑥]，给了汤先生推论的有力确证。因而从以上两条，我们证明了汉武帝时期中原就知道佛教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经过近代以来诸多学者对鱼豢《魏略 · 西戎传》："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⑦]和《后汉书 · 楚王英传》：

[①]【晋】干宝 撰.《搜神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88 页
[②]【南朝梁】慧皎 撰，汤用彤 校注，汤一介 整理.《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3 页
[③]陈寅恪.《读书札记三集》. 陈寅恪集. 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2 页
[④]【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09 页
[⑤]汤用彤 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8-9 页
[⑥]谢剑.《匈奴宗教信仰及其流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民族与社会变二）》.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1119-1150 页
[⑦]【北齐】魏收 撰.《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025 页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①]等记载的考证[②]，证明了佛教传入中原地区的时间是在两汉之际。

最后我们还需要看看佛教最初在中国的性质问题。梁启超先生根据《高僧传·佛图澄传》曰：“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尝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修前轨。”[③]和《历代三宝记》中说朱士行乃汉地沙门之始的记载认为佛教最初的传播是在移民到中国的外国人中，未及普通汉人。[④]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也有相同的意见。[⑤]而从上所引的楚王英等的记叙我们可以知道似乎汉地之人最初是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方术，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按佛教在汉代纯为一种祭祀。其特殊学说为鬼神报应。王充所谓‘不着篇籍，世间淫祀，非鬼之祭’佛教或其一也。祭祀既为方术，则佛徒与方士最初当常并行也。”[⑥]而在出土文物中，连云港市孔望山一处东汉岩壁画像上，佛像与西王母、道教人物等刻画在一起[⑦]，则间接证明了汤先生推断是正确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求取佛经这种事情应该是在佛教信仰已经传入中原地区一定时间，汉人对其义理有跟深理解需求的时候产生，因而先不论张骞时代之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官方派人求取佛经之事似乎是不可能的。

3.1.2 武帝时期西域地区的信仰

对于西汉时期新疆及中亚人民的信仰问题，由于资料的稀少，目前为止在学术界也没有具体的论述及结论。但是研究者还是从文献的只言片语中作了一些合理的推断。

首先说匈奴，从上节我们所列举出的诸家说法已经证明了匈奴人是亚欧大陆北方广泛存在着的原始萨满信仰。其次看西域，梁启超和汤用彤先生都举出了西方考古学家在阿富汗北部和印度西北部地区发现了属于希腊种族的弥兰王的钱

[①]【南朝宋】范晔 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428-1429页
[②]参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
[③]【南朝梁】慧皎 撰，汤用彤 校注，汤一介 整理.《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2页
[④]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⑤]【荷】许理和 著.李四龙 译.《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26-27页
[⑥]汤用彤 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31页
[⑦]【日】鹤间和幸著，马彪 译.《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03.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4年.第399页

币，上有“护法王”字样，表明汉初时期佛教以流传于印度西北部地区，而大夏国亦是希腊种族且地理位置接壤，则佛教似应流传到了大夏[①]。所以张骞到达大夏之时，应该知道有佛教的存在，但是在第一章中我们知道了《史记·大宛列传》很大程度上是张骞的报告，但却无一语有涉佛法信仰，那么可以推测佛教于大夏未为盛，张骞故而没有放在心上，《后汉书·西域传》对此也有过一些论说给我们启示："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着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余闻之后说也，其国则殷乎中土，玉烛和气。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神迹诡怪，则理绝人区，感验明显，则事出天外。而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②]

大月氏在被匈奴所破西迁大约一百多年后，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贵霜帝国。汤用彤先生论迦腻色伽王祖父丘就却说："其货币上尝刻佛像。又曾刻文曰'正法之保护者'。丘就却之信释教，实无可疑。此王在位，要在西汉之末，或东汉之初。"[③]故鱼豢《魏略·西戎传》中"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④]的记载应该有所本。贵霜帝国将西域与印度连接在一起，佛教大力传播于西域以达中原地区应该是这时期开始的。季羡林先生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证明了"浮屠"二字是来源于印度西北部的俗语，进而推论："这部书（《四十二章经》）从印度传到大月氏，他们还没来得及译成自己的语言，就给中国使者写下来。"[⑤]所以传说张骞就去取佛经是根本不可能的。

3.2 文献中张骞传入佛经的记载

张骞取佛经的传说故事是与汉明求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传世文献中关于这则故事的记载已经有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的专论《汉明帝感梦遣使求经事考证》全部收集到[⑥]，且加以辑录。因此我们不打算把这些原文记载一一罗列。这里只列出一张表，抽取出其中的人物和情节：

分组	出处	人物	情节	物体
第一组	《四十二章经》	傅毅/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	帝问毅答、大月氏写经、立塔寺	

[①]汤用彤 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28 页
[②]【南朝宋】范晔 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31-2932 页
[③]汤用彤 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29 页
[④]【北齐】魏收 撰.《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025 页
[⑤]季羡林.《浮屠与佛》.《佛教十五题》.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第 95 页
[⑥]【法】马伯乐 著，冯承钧 译.《汉明帝感梦遣使求经事考证》.《马伯乐汉学论著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286-300 页

		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		
	《牟子理惑论》	傅毅/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	帝问毅答、大月氏写经、建寺	佛寺、壁画、佛像
	《老子化胡经》	傅毅/张骞	帝问毅答、张骞穷河源经三十六国至舍卫	
	《出三藏记集》	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	到西域遇月氏国竺摩腾	
	《汉法内传》	傅毅/国子博士王遵、太史苏由/中郎蔡愔、中郎将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迦叶摩腾、竺法兰	帝问毅答、王遵对曰、苏由对曰、遣使天竺遇摩腾、法兰、译经、画像	白马寺、释迦像
第二组	《吴书》	中郎蔡愔等	西域访佛	
	《高僧传》	傅毅/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摩腾	帝问毅答、蔡愔天竺遇摩腾、腾译《四十二章经》	精舍、白马寺
	《魏书》	傅毅/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迦摄摩腾、竺法兰	帝问毅答、遣使天竺遇摩腾、法兰、愔得《四十二章经》	白马寺、释迦像
	《冥祥记》	（或曰）/（发使）/使者蔡愔/迦叶摩腾	帝问人答、发使天竺得经像、迦叶摩腾画像	释迦像、壁画、白马寺
第三组	《后汉纪》	（或曰）/（遣使）	帝问人答、使天竺问道术图其像	
	《后汉书》	（或曰）/（遣使）	帝问人答、使天竺问道术图其像	
	《水经注》	（或曰）/（遣使）	帝问人答、发使天竺写经像、建寺	白马寺
	《洛阳伽蓝记》	（遣使）	遣使西域得经像	白马寺

从以上这个表格，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组主要是佛教著作，除开《汉法内传》将三组故事全部整合添加到一起因而没有张骞名字外，其他都是说求经者为张骞，我们可以设想这种说法在当时的宗教界有着广泛的传播。第三组主要是

正史，由于全都是有专业素养的史学家编写，因此对于不知道的人名绝不肯轻易下言，所以仅仅只是用模糊的“或曰、遣使”，但是地点却吸取第二组的说法，将大月氏改成了天竺。第二组则是在《吴书》将张骞改成了蔡愔后，又根据佛教界的传说增加遇迦叶摩腾、竺法兰等情节。而从时间上来说，我们根据表格也能看到张骞取佛经这个故事由于其本身存在的时间上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被史书和其他书籍修改的过程。

但是即使这个传说没过多久就被修改，但是张骞求取佛经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流传。开凿于初唐的敦煌莫高窟第 323 窟主室北壁就有四幅“张骞出使西域图”壁画。其讲述的分别是汉武帝拜金人、送别张骞使西域求佛、前往大夏艰辛之旅、大夏迎接张骞一行。学者孙修身的《从<张骞出使西域图>谈佛教的东渐》对着四幅图有非常详细的描写，这里就不赘述了。其图如下：



图 1　莫高窟第 323 窟主室北壁史迹画　初唐



图 2　莫高窟第 323 窟主室南壁史迹画　初唐

莫高窟第 323 窟“张骞出使西域图”[1]

表现武帝拜金人故事的壁画上有题字“汉武帝将其部众讨 / 凶奴，并获得二金（人）长丈 / 余，列之于甘泉宫。帝为 / 大神，常行拜谒时”[2]。送别张

[1]转引自沙武田.《角色转换与历史记忆——莫高窟第 323 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艺术史意义》.《敦煌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23 页

[2]沙武田.《角色转换与历史记忆——莫高窟第 323 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艺术史意义》.《敦煌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24 页

骞出使的图上有字为：“ 前汉中宗既获金人，莫知名 / 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 / 域大夏国问名号时 ”[1]。大夏迎接张骞图上有“ ■大夏时 ”[2]。

这幅壁画非常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世说新语 ·文学篇》刘孝标注的一段文字：

> 《汉武故事》曰：“ 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宫。金人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唯烧香礼拜。上使依其国俗祀之。”此神全类于佛，岂当汉武之时，其经未行于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3]

又《魏书 · 释老志》曰：

>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祭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4]

值得注意的是，魏收在记叙张骞出使西域之时加入了《史记》《汉书》上没有的“ 始闻有浮屠之教 ”这几个字，而张骞闻“ 浮屠之教 ”的记载很有可能是当时有着这种传说，而魏收等不加辨证地将它记录了下来。因而形成了壁画作者自己或者说是社会上流传的一套张骞取经的故事逻辑与情节模式 :故事起因是汉武帝得到金人礼拜有加，试图想要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求佛号云云；然后就派遣凿空西域的张骞去求取佛号和佛经，经过重重跋山涉水的艰辛旅程，终于到达了佛光普照的大夏国完成出使任务。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印度之交通》中统计了三国到唐中叶五百年间西行求佛僧侣中可考的人名、生死等状况，平安学成归国之人仅仅只有四分之一，而死于道路、中途折返等占了四分之三[5]。可以想象得出要到达西域及印度的旅程是多么得艰苦，正是法显《佛国记》中所记载的“ 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6]，“ 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 ”[7]《高僧传 · 昙无竭传》：“ 登葱岭，度雪

---

[1]沙武田.《角色转换与历史记忆——莫高窟第 323 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艺术史意义》.《敦煌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24 页

沙武田.《角色转换与历史记忆——莫高窟第 323 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艺术史意义》.《敦煌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24 页

[3]余嘉锡 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 整理.《世说新语笺疏》. 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253 页

[4]【北齐】魏收 撰.《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025 页

[5]梁启超.《中国印度之交通》.《佛学研究十八篇》.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第 116 页

[6]【东晋】沙门释法显 撰，章巽 校注.《法显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6-7 页

[7]【东晋】沙门释法显 撰，章巽 校注.《法显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24 页

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行经三日，复过大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皆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日方过。及到平地相待，料检同侣，失十二人。"[①]这幅壁画糅合了张骞取经传说和西行求法僧侣的心得体会。可以想象古代的僧侣对信徒讲述张骞取经故事的时候一定有绘声绘色，"添油加醋"的讲述，只可惜没有文字流传下来。

唐代中期以后，佛教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中国化，各宗林立，互为竞争，而西行求法之事及愿望也衰落下去，因而在后来张骞西行求佛的故事在后世除了抄掇佛经中提到之外就绝少出现了。

3.3 佛教传入附会张骞之成因

这种佛教传说故事形成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张骞本身在开拓西域事迹中的显赫地位，传说故事附会到相关名人身上也是大众心理。但是事情也绝非如此简单，应该还有更深入的缘由。

其附会的第一个契机就是在上一节所提到过的"金人"误解。《后汉书·陶谦传》曰："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②]表明东汉时期社会上就已经开始流行佛教的金像制作与礼拜。由于"金人"这个词本身的歧义性，汉魏以后，后世将《史记》中"休屠王金人"由于佛教的深入传播而误解为佛教金像，如《史记集解》曰："崔浩云：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图金人是也。"[③]《史记正义》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遗法，立以为祭天主也。"[④]魏晋时人将"金人"作为佛教传播媒介的工具，《魏书·释老传》曰："司马迁区别异同，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义。刘歆着《七略》，班固志《艺文》，释氏之学，所未曾纪。案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⑤]这意味着魏晋时期，人们认为"休屠王金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并且这段话还证明了上节所讨论的敦煌"张骞出使西域图"壁画的内容是当时所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而公元前 121 年霍去病俘获休屠王得金人与"汉使博望侯

[①]【南朝梁】慧皎 撰，汤用彤 校注，汤一介 整理.《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93 页
[②]【南朝宋】范晔 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368 页
[③]【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09 页
[④]【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09 页
[⑤]【北齐】魏收 撰.《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025 页

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①]是同一年，且都是攻打匈奴，时间与讨伐对象的相同使得“金人”（后世解读为佛像）与张骞联系在一起。

其二则是这个传说应该是汉末魏晋时代佛道之争下的产物。这牵涉到老子出关的传说。荷兰汉学家许理和在其著作中考订了西晋道士王浮为佛道之争伪造的《老子化胡经》中“化胡”的传说源流，并且同意伯希和论证了这个传说可能不会早于司马迁的时代的看法。[②]而有趣的是出关传说的形成又是与张骞的时代相接近。既然传说老子早已去西方教胡为浮图，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正确性，那么即使时间上有矛盾或者不了解历史人物年代，王浮自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凿空西域的张骞了。

最后，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是汉明帝。梁启超认为："永平八年赐楚王英之诏书，为其作伪取资之动机，殆可为断言。盖此诏书，必为当时佛教徒所最乐称道，因此不知不觉间，将汉明帝与佛教生出关系。”[③]此说甚确。还有一点，《后汉书·西域传》曰："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明年，始置都护、戊己校尉。”[④]则知汉明帝对于复开西域是交通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而后世传说出明帝梦神人，派人去求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总之，通过这一章的考察，我们可以说在对“金人”不可避免的历史性误读及佛道相争时代背景下产生了张骞西行求法的传说，但由于时代矛盾，很快就被历史学家给修改了。但是这种附会说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为佛教徒们所广为传道。另外还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这个传说开始，张骞的西行的起因和目的已经加入到了整个叙事的结构之中：[起因：帝王有目的的指派]，张骞出使西域，[结果：求得佛号、佛经]。

在张骞的传说中，还有一则是关于他传入西域乐曲《摩诃兜勒》的记载，但是这个传说比较单一，无法独列为一章，且其与印度及佛曲有关，故而附于此章之后。

古籍中最早记载张骞传入《摩诃兜勒》的是崔豹《古今注》：

[①]【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08 页

[②]【荷】许理和 著.李四龙 译.《佛教征服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375 页

[③]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附录一：汉明求法说辨伪）》.《佛学研究十八篇》.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第 22 页

[④]【南朝宋】范晔 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09 页

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世用者《黄鹤》《龙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华子》《赤之阳》《望行人》等十曲。[①]

但是仲铎、阴法鲁等学者认为这一段记载是后人将《后汉书 · 班超传》李贤注引的南朝陈僧人智匠《古今乐录》中的相关段落移入《古今注》中的，并给出了几点理由。[②]我们认为他们的推断很正确，因为这个传说涉及到张骞、李延年等西汉重要人物，且创作的新曲还是用来作军事上非常重要的武乐，但在《史记》《汉书》等中却一点都未提及。直到南北朝时期才有了这种说法，考虑到时代间隔如此之大以及当时的作伪风气，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传说并非史实，而是附会说法。而这个传说后世《晋书 · 乐志》《白氏六帖事类集》等中都有记载。

[①]【晋】崔豹撰.《古今注》.《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39 页
[②]阴法鲁.《中国古代音乐史料杂记三则》.《音乐研究》.1988 年.第 1 期.第 17-18 页

4 由“穷河源”所引出的张骞传说

在所有有关张骞的传说当中，由史书上“穷河源”三字所引出的故事是流传时间最长和变化形式最为丰富的。本章既从时间上梳理这个传说的源流，探讨其演变背后的缘由。

4.1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是张骞出使西域与昆仑、天河、牛郎织女、支机石等传说故事开始融合的滥觞，为成为了这个故事模型的基础。

4.1.1 古人对“河源、天河”的认识

张骞“穷河源”三字来自于《史记·大宛列传》：“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①]，又“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岛岛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②]自此，后世史学家皆承袭这种语句，如《汉书·张骞传》：“而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牦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而汉使穷河源，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③]《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曰：“及汉氏遣张骞使西域，穷河源，经历诸国，遂置都护以总领之，然后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详载焉。”[④]我们可以从文字中看出，司马迁在其疑问中所否定的是“不雅驯”的古代神话中河所出的仙界昆仑，而肯定的是张骞将仙界昆仑拉回到了现实中的西域确切地点，认为在于阗南，是河源之所出地。《史记正义》注曰：“言《本纪》及《山海经》所言奇怪之物，余不敢叙也。”[⑤]王鸣盛也说：“《大宛》赞只辩昆仑虚妄，余置不论。”[⑥]

再来看看“天河”即银河，古代称为“汉”（《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⑦]）、“云汉”（《诗经·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⑧]）等名称。但是“汉”同样也指地上的河流，最著者即是汉水，如

[①]【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60 页
[②]【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79 页
[③]【东汉】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696 页
[④]【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840 页
[⑤]【西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4161 页
[⑥]【清】王鸣盛着，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2005 年.第 37 页
[⑦]【清】王先谦撰.《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730-731 页
[⑧]【清】王先谦撰.《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952 页

《国风 · 周南 · 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①]由于名称的相同，很容易将地上的河流与天上的天河联想起来。

4.1.2　文献中“ 张骞乘槎 ”传说的形成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 张骞乘槎 ”传说的形成问题，邓绍基、陶喻之、和李荣华等学者都作了论文对此加以论证, 因此我们打算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此传说的演变、与其他故事的融合为重点来加以考察论证。

张华《博物志》记载：

>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查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尽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 何由至此？ ”此人见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 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 ”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 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 ”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②]

“ 旧说云 ”三字表明这则传说并非自创，而是来自于在他之前的时代，而这也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将乘槎人、牛郎织女和严君平糅合在一起的故事传说。

《太平御览》卷八“ 天部 ”里保存了刘义庆《集林》中的一则：

> 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 此天河也。 ”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 此支机石也。 ”[③]

虽然比上一则简略，但我们任然相信这则故事比张华晚出，因为它增加了三个人勾连的中介：支机石。

经过邓绍基先生的研究，发现本来是没有名字的主人公，到了南朝庾肩吾、庾信父子的诗歌中将其称为了“ 汉使 ”，并且把它与“ 仙槎 ”“ 七夕 ”联系在勒一块儿：如庾肩吾《奉使江州舟中七夕诗》“ 九江逢七夕，初弦值早秋。天河来映水，织女欲攀舟。汉使俱为客，星槎共逐流。莫言相送浦，不及穿针楼。 ”[④]庾信《七夕》：“ 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隔河相望

[①]【清】王先谦撰.《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51 页
[②]【晋】张华撰，范宁 校证.《博物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11 页
[③]【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42 页
[④]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1995 页

近。经秋离别赊。愁将今夕恨。复着明年花。”[①]得出这个故事的形成时代就在南朝宋到梁的这一百多年间[②]这个令人信服的推断。

由“汉使”自然而然联想到了张骞，因而故事主角也就有了具体的名字，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有记载：

> 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经月，而至一处，见城郭知州府，室内有一女织，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骞问曰："此是何处？"答曰："可问严君平。"织女取楮机石与骞俱还。后至蜀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楮机石为东方朔所识。[③]

从此这个故事的各个情节也就定了型了。后世皆在这样的文本上有部分改动，如明曹学佺《蜀中广记·人物志》载：

> 初，博望侯张骞使大夏，穷河源，归，舟中载一大石，以示君平。君平咄嗟良久，曰："去年八月，有客星犯牛女意者，其君乎？此织女支机石也。"博望侯曰："然。吾穷河源至一处，见女子织锦，丈夫牵牛。吾问此何地。女子答曰：'此非人间也。何以到此？'因指一石曰：'吾以此石寄汝舟上，汝还以问蜀人严君平，必为汝道其详。'"君平曰："吾怪去年客星入牛女，乃汝乘槎，已到日月之旁矣。遂相与诧异人，乃始知成都卜肆中者，非常人也。年九十卒。[④]

4.1.3 此时期“张骞乘槎”传说形成原因

从上面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所形成的这个“张骞乘槎”传说主要有是有三个事件组成：张骞穷河源、牵牛织女、严君平占卜。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探讨它们是如何联系与融合起来的。

4.1.3.1 穷河源与天河到海联系

唐代赵璘《因话录》说："《汉书》载张骞穷河源，言其奉使之远，实无天河之说。惟张茂先《博物志》说……都是凭虚之说……前辈诗往往有用张骞槎者，相袭谬误矣。纵出杂书，亦不足据。"[⑤]而我们这小节便是要探讨这个“相袭谬误”的原因。

[①]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376 页
[②]邓绍基.《典实和传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张骞》.《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一期.第 10 页
[③]【宋】陈元靓撰.《岁时广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 年.第 308 页
[④]【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四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唐】赵璘撰.《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第 108 页

上节已经引用过《汉书·张骞传》：“ 而汉使穷河源，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①]《集林》载：“ 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 此天河也。 ’乃与一石而归。 ”[②]一个是“ 穷河源 ”，一个是“ 寻河源 ”，文字有相同之处，这个“ 一人 ”，由于有了诗人们笔下的“ 汉使 ”这个模糊词为中介，后世就将其附会到了张骞身上：所要“ 穷 ”的“ 河 ”变成了“ 天河 ”，而“ 天河 ”最著名的传说便是牛郎织女。而为什么要给“ 一石 ”呢？我想这自然是从“ 其山多玉石 ”而来的，但是毕竟这个妇人是谁的谜底还没有解开，那么这个石头便成为了解开的证物。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穷河源 ”的方式为什么是“ 乘槎 ”？王嘉《拾遗记》中有“ 贯月槎 ”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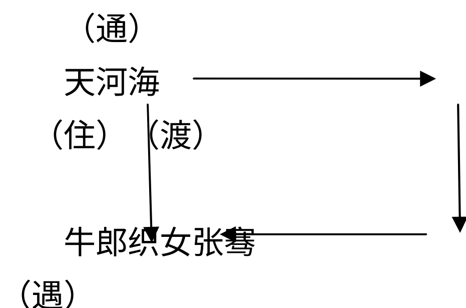
> 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昼灭。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曰贯月查，亦谓挂星查。羽人栖息其上，群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则如暝矣。虞、夏之季，不复记其出没，游海之人，犹传其神伟也。[③]

“ 巨查 ”在海上，而“ 旧说天河与海通 ”（《博物志》）。自然“ 巨查 ”便可在海与天河间来往，时间是在八月。

张骞也与海有着关系。张骞是知道西方是有海的，第一章论证过《史记 · 大宛列传》前半部分大概是张骞的回国报告，有言：“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 ”[④]，又“ 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靬、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⑤]张骞之后有如此的出使频率、规模和时间之长，我们可以推测即使没有史书记载，张骞之后的汉代使者对从新疆到中东这一带的地区是能有较深的了解，甚至到达过。能够找到名字者为东汉甘英，《后汉书 · 西域传》：“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 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 ’英闻之乃止。 ”[⑥]《魏略》的说法显然是承袭而来：“ 大秦国一

[①]【东汉】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696 页
[②]【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42 页
[③]【晋】王嘉撰.《拾遗记》.《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498-499 页
[④]【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63 页
[⑤]【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70 页
[⑥]【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18 页

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①]司马贞《史记索隐》述赞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窥海上。条枝西入，天马内向。葱岭无尘，盐池息浪。旷哉绝域，往往亭障。”[②]由“汉使”联想到张骞，因此后世有了张骞渡海的说法，《博物志》载：“汉使张骞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滨，有小昆仑，高万仞，方八百里。东海广漫，未闻有渡者。”[③]到这里，我们又证明在当时的民间传说中张骞与海有着交集。故作图如下：



在汉代的杂史中，张骞与牛郎织女还有间接的关系。

《史记·大宛列传》曰：“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厓，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④]从这段记载可知汉武帝想要征服滇国等西南地区以通身毒是在张骞游说下进行的。武帝为伐滇国建造了昆明池，《汉书．武帝纪》曰：“发谪吏穿昆明池。”[⑤]颜师古注曰：“臣瓒曰:《西南夷传》有越嶲、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货志》又曰：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遂乃大修昆明池也。”[⑥]这样，张骞就与昆明池有了联系。

而汉代关于昆明池有许多的野史故事，其中就有关于牛郎织女传说的，汉魏杂史书《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曰：象天河。”[⑦]张衡《西京赋》曰：“昆明灵沼，黑水玄址。牵牛立其右，织女居其

---

①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860 页
②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80 页
③ 【晋】张华撰，范宁 校证.《博物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1 页
④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66 页
⑤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166 页
⑥ 【东汉】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77 页
⑦ 【魏晋】佚名撰.《三辅故事》. 龙溪精舍丛书.第 151 页

左。”[①]这种说法后代广为接受，如南朝陈阴铿《咏石诗》：“天汉支机罢。仙岭博綦余。零陵旧是燕。昆池本学鱼。云移莲势出。苔驳锦纹疏。还当穀城下。别自解兵书。”[②]唐童翰卿《昆明池织女石》：“一片昆明石，千秋织女名。见人虚脉脉，临水更盈盈……”[③]。因此可以推测，古人会以昆明池为中介，将张骞与牛郎织女的传说融合起来。

其次，它们之间还有一个连接点，那就是地域联系。张骞祖籍在现在的城固县，其封地南阳，两者都在汉水流域。而牛郎织女传说的产生地，有学者通过对星宿、《诗经·大雅·大东》、秦简《日书》等文献的梳理与研究，论证了这个传说是汉水流域文化的产物以及其传播。[④]一个是历史文化名人，一个是广泛传播的民间故事。地域的重叠也成为了两者故事有所交集的重要因素之一。

4.1.3.2　张骞与严君平、支机石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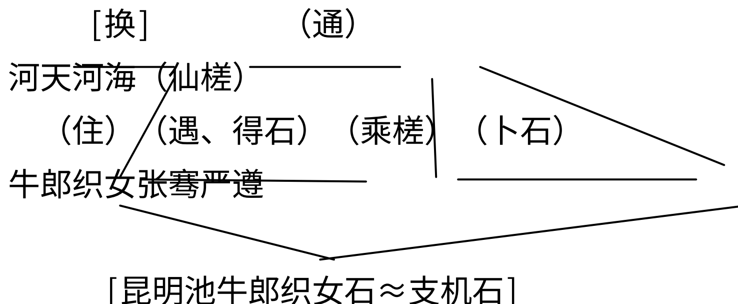
蒙文通先生认为：“把词赋、黄老、阴阳、数术合为一家的很多，这种风气好像在巴蜀是有深远的基础……词赋和黄老、天文、灾异之学，在两汉时巴蜀颇以此见称”[⑤]在这样一种地域文化思想背景下，巴蜀产生了非常多的道家神仙故事，而汉代严遵即严君平就是传说中的“蜀中八仙”之一。《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卷引《洞天集》曰：“严遵仙槎，唐置之于麟德殿。长五十余尺，声如铜铁，坚而不蠹。李德裕截细枝尺余，刻为道像，往往飞去复来。广明以来失之，槎亦飞走。”[⑥]说明古代严遵和飞天的槎有联系。

又关于支机石。巴蜀地区自古“大石崇拜文化”盛行，古代文献中留存着许多四川平原五块石、天涯石、支机石、石笋等记载。学者黄剑华认为这些大石都是从很远的四川西方和北方的山中搬运回来的。[⑦]这正与传说的张骞天河得支机石到成都问严遵的线路大致一致。传闻中支机石是有神力的，《蜀中广记·蜀中名胜记》对支机石有神奇的记载：“《道教灵验记》云：成都卜肆支机石，即海客携来，自天河所得，织女令问严君平者也。太尉炖煌公好奇尚异。命工人镌取支机一片，欲为器用。椎琢之际，忽若风瞀，坠于石侧，如此者三。公知其灵物，乃已之。至今所刻之迹在焉。复令穿掘其下，则风雷震惊，咫尺昏曀，遂不敢犯。”[⑧]而上文已经论述过汉代昆明池中亦有牛郎织女石，从隋虞世基《赋昆明池一物得织女石诗》：“隔河图列宿，清汉象昭回。支机就鲸石，拂镜取池灰。船疑海

[①]【东汉】张衡着，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59 页
[②]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458 页
[③]【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7011 页
[④]梁中效.《汉水流域文化与牛郎织女星神》.《安康学院学报》.2013 年 8 月第 25 卷第 4 期.第 1-5 页
[⑤]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98-99 页
[⑥]【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272 页
[⑦]黄剑华.《古代蜀人的大石崇拜》.《成都日报》2009 年 12 月 28 日.第 1 页
[⑧]【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四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槎渡，珠似客星来。所恨双蛾敛，逢秋遂不开。”[①]这首诗中可以看到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已经将昆明池上的牛郎织女石于支机石等同起来了。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何织女给张骞的是支机石而非其他凭证。

因此，我们现在再画出一张图示：



4.1.3.3 魏晋南北朝时期升仙思想与志怪故事

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和游仙诗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突然涌现，出现了大量优秀且具影响力的作品。《魏书·释老志》曰：“至于化金销玉，行符敕水，奇方妙术，万等千条，上云羽化飞天，次称消灾灭祸。故好异者往往而尊事之。”[②]李剑国先生也认为：“此期宗教迷信的昌炽及其影响之广泛；其次谈风的盛行，促使了志怪故事的产生、传播和集中；另外，文人著述的活跃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对志怪小说的创作和艺术进步也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③]魏晋时人许多都醉心于炼丹、服药，想要摄含精神，永存生命。如魏武帝的“好养性法，亦解方药”[④]，何晏等人服“五石散”等等。这种试图永生的欲望和玄风的大炽使文人们形成了由世间而及仙境的创作思维模式。所以在文言小说中产生出《幽明录》中阮肇、刘晨采药山中遇仙归家过已百年等仙境传说。诗歌中则体现为大量的游仙诗创作，如曹丕《折杨柳行》：“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轻举生风云，倏忽行万亿。”[⑤]曹植《游仙诗》：“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玄天渚，南翔陟丹邱。”[⑥]郭璞“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⑦]等等。可以说张骞乘槎游天河的传说也是这样一种文学思想下的产物。

最后，我们来总结本节：张骞的出使有了明确的任务和目的：穷河源；由于“河”词的模糊性以及这一时期羽化登仙的思维模式下，来到了天河，与天河的

[①]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713-2714页
[②]【北齐】魏收撰.《魏书·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9页
[③]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19页
[④]【晋】张华撰，范宁 校证.《博物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1页
[⑤]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4页
[⑥]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56页
[⑦]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65页

星辰织女有了交集；而张骞所得之石最终在有大石崇拜的蜀地神仙严遵解答。这是在文学内部变化规律与外部客观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4.2 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由“ 穷河源 ”所引出的张骞传说有因袭，有新变，还有对它的质疑与考辨。

4.2.1 “ 张骞乘槎 ”传说的因袭

有唐一代，由于帝王家推崇道教，对表现出仙化特点的张骞乘槎传说人们是津津乐道的。但是遗憾的是，传世文献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文本。唐代李冗的传奇小说集《独异志》有一则故事：

> 海若居海岛，每至八月，即有流槎过。如是累年不失期。其人赍粮乘槎而往，及至一处，见有人饮牛于河，又见织女，问其处，饮牛之父曰：“ 可归问蜀严君平，当知之。 ”其人归，诣君平。君平曰：“ 某年月日，有客星犯斗牛，计时，即汝也。 ”其人乃知随流槎至天津。[①]

虽然没有点出具体的张骞名字，但一望便知这是张骞乘槎的故事。

对于这个传说在唐代的流传情况，虽没有找到直接的记载，但是大量的唐诗赋对于它的化用已经充分说明了其传播是非常广的。

唐赋中有关乎此者有王勃《七夕赋》：

> 布元气于浩荡，运太虚于寥廓。辨河鼓于西壖，降天孙于东塄。循五纬而清黄道，正三衡而澄紫落。海人支石之机，江女穿针之阁。[②]

谢偃《明河赋》：

> 亘紫极以斜转，横碧空而中分。吐霄光而澹滟，含曙色而氤氲。将欲问之于槎客，如何欲决于严君。[③]

卢肇的《天河赋》：

[①]【唐】李冗撰.《独异志》.《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906 页
[②]【清】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年.第 149 页
[③]【清】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年.第 588 页

……渡蟾魄之孤轮，不闻濡轨；张鹊桥之远岸，讵见操舟。莫议高深，孰能揭厉。演漾必滋于若木，氛氲更袭于丹桂。映苍山而渐出，想积石于河源。拂远树以将低，误一苇于天际。遥思濯手，远忆乘槎。流合璧之辉，几疑沉玉；映散金之气，或类披沙。辨牛岂见其津涘，闻鸡遽隐于云霞。是宜以河之名，居天之大。阁道蛇横于曲渚，骊珠蚌剖乎浅濑。……[①]

等赋中“河源”“乘槎”“辨牛”等词语让我们知道张骞乘槎传说成为了关于天河的重要神话之一。

又唐代何类瑜有《查客至斗牛赋》：

客有远人，寰家海沉。声销迹卷，兑塞巧绝。浩然太素之和气，劲然乔松之全节。当郁岛以闲安，就灵涛以怡悦。喜仙查之千里，每秋风之八月。知必至之不欺，乃乘流以长发。尔乃制芰俶装，舂菰裹粮。以昼以夜，若行若藏。沈浮于渤澥之中央，荡摇乎辔轧之大方。岂灵怪之历讨，实险阻之备尝。独出于有间之世，转入于无何之乡。听不闻其声，类冯异之依大树；久乃有所遇，若伊尹之在空桑。乘悠远兮不知其行，道渺弥兮无遗其迹。人与木兮俱浮，天与海兮同碧。次黄道之的的，穿白榆之历历。反不记其所从，又焉知其所适。饮牛于津者谁子，弄杼于室者何人。轧轧有声，缤绮缟兮如雪；盈盈不语，粲明眸兮若神。忽愕眙以相顾，虽婉娈而不亲。既持石以赠子，令致问于严遵。当是时也，星则知客犯尔位，客不知星则吾身。何碧空之无涯，乃飘然而独往。非智力之所及，实风波而是仰。昔未乘查也，则在地而成形；今之乘查也，则在天而成象。若不资巨浪之潜运，安得排青冥而直上。倬彼星汉，自天而垂。澹横河之清浅，皎列宿以参差。客无查，徒劳勤而事何可济；查非客，虽往来而世莫之知。信其致人于霄汉者，不必轻舟迅楫之力。忘情于夷险者，亦无波臣川后之欺。吾既异此事，乃斯焉而赋斯。[②]

在这首赋中, 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赋家运用优美细腻的语言描述了乘槎过程中天河的景色以及主人公的感受，还增加了出发前的“制芰俶装，舂菰裹粮”这种备粮情况。

唐诗中对张骞乘槎典故的化用表现出了为不同宗旨而服务的现象。有关心国家前途安危，表现战争之作，如杜甫《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忆昨趋行殿，殷忧捧御筵。讨胡愁李广，奉使待张骞。”[③]《秋兴》：

[①]【清】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 年.第 25 页

[②]【清】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 年.第 24 页

[③]【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428 页

“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查。”[①]《哭李尚书》：“风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修文将管辂，奉使失张骞。”[②]《东楼》：“楼角临风迥，城阴带水昏。传声看驿使，送节向河源。”[③]；对仕途担忧者，元稹《感石榴二十韵》：“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迢递河源道，因依汉使槎。”[④]；表现恋情的，如李商隐《海客》：“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⑤]等等，不一而足。

4.2.2 张骞寻源传说的新变

非常幸运的是，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两个关于张骞“穷河源”的传说。兹录如下：

> **1）伯三六四五《前汉刘家太子传》[片段]**……《史记》曰：汉武帝使大夫张骞赍衣粮，寻盟津河上源，西王母闻此莫然笑曰：“盟津河在昆仑山腹壁出，其山举高三千三百六十万里，纵虽卿一生如去，犹不能至。卿可还国，与卿支几之石，报卿君命。”张骞用其言，将石还国，具与西王母言奏帝。帝得此石，在于殿前，慕（募）及国内，谁能识之？东方朔识之：“此是西王母支几玉石，因何至此？”帝乃大悦龙颜，封张骞为定远侯……至七月七夕，西王母头戴七盆花，驾云母之车，来在殿上，空中而游。帝见之心动，遂不得仙。西王母将桃五枚，来在殿上奉帝；帝食桃，手把其核如不弃之。王母谓帝曰：“陛下何不弃其核？”帝曰：“朕见桃美味，欲种之后园。”西王母笑而应之曰：“此桃种之，一千年始生，二千年始长，三千年始结花，四千年始结子，五千年始熟。陛下受命不过一百年，欲种此桃，与谁人食之？”当此之时处，有东方朔在于殿前过见，西王母指东方朔云：“此小儿三度到我树下偷桃，我捉得，系着织机脚下，放之而去之，今已长成。”……[⑥]

在这一篇敦煌变文张骞情节片段中，我们同样也看到了“衣粮”字眼，又上引过何类瑜《查客至斗牛赋》也有相同文辞，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唐代流行的乘槎传说中必定添加了这个情节。

更有趣的是，这篇变文将织女赠支机石置换为了西王母。识此物者成为了东方朔。对于转换为东方朔，第三章和本章上文已经论证过了东方朔与昆明池的关

[①]【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509 页
[②]【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563 页
[③]【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420 页
[④]【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4539 页
[⑤]【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6198 页
[⑥]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244 页

系，而池又干涉牛郎织女进而到张骞，再加上二人本都是武帝时代响当当的人物，严遵置换为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而为何又出现西王母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古人对于昆仑和河的认识其地理位置众说纷纭，清代梁玉绳论曰："两汉《西域传》及《水经注》言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又"传记言传记言昆仑有五处，一在西域，近《禹贡》昆仑国；《山海经·西次二经》谓在槐江山之南，即《海内西经》所云'昆仑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者，唐释玄奘《西域记》名为阿耨达山，又名无热丘是也；一在海外，《山海·大荒经》谓'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曰昆仑，其下弱水环之'，近条支、大秦国，《禹本纪》所称者是也；一在于阗，汉武帝案古图书名之于阗之山为昆仑是也；一在酒泉，《汉志》金城临羌县西北有昆仑……一在吐蕃，《通典》言吐蕃自云昆仑山在国中西南……五处昆仑，当定吐蕃为真河源之所出。"[①]第二、三说法是汉代所流行的。张骞和西王母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张骞报告的《史记·大宛列传》中就有记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②]《史记正义》注："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长老传闻而未曾见，《后汉书》云桓帝时大秦国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处，几于日所入也。"[③]这是梁氏所举出的第二种说法。而第三种说法又是张骞使西域所到过之处。杨宪益先生认为："西王母传说似乎始于汉武帝时，……汉武帝见西王母……《洞冥记》《拾遗记》《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海内十洲记》等书……从这些故事的内容看，西王母的故事，显然是因了武帝通西域，民间闻见远方异物，附会而成的。卫聚贤先生曾说西王母的故事于汉武帝征大宛有关；这假设似乎颇为可能，当时大宛的王称为王母寡，西王母可能即由此附会而成。"[④]并且，由于时人对于西域地理环境的进一步了解，张骞所寻的河源自然被认为了是寻找黄河源头。唐王之涣《凉州词》有"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句，表明在唐人的浪漫想象里，黄河是可以通到白云飘动的天上。"白云"一词，我们也很容易想到西王母，《穆天子传》载："乙丑，天子觞西王毋于瑶池之上。西王毋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⑤]由于《穆天子传》时代和真伪难辨，这里不加以探讨，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情节与《汉武故事》汉武帝求见西王母，后王母来宫中见武帝是

[①]【西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160页

[②]【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163-3164页

[③]【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164页

[④]杨宪益.《译余偶拾》.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87-88页

[⑤]佚名撰，【晋】郭璞注.《穆天子传》.《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来源或者受它影响的产物。这里，白云与西王母，白云与黄河，黄河与张骞的关系唐人非常容易联系起来，如刘禹锡《浪淘沙（其一）》为“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①]任半塘先生认为《浪淘沙》唐代在是接近民歌，多来源于民间风土传说内容[②]。所以在唐代演变出武帝派张骞求见西王母的故事传说是顺理成章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篇敦煌变文中，张骞传说已经开始了与其他故事联系而形成更大的叙事结构，如这里就将武帝派张骞求见王母的故事于东方朔窥母、偷桃的情节联合在一起。

同样我们作图如下：

（解石）

织女东方朔

（见、得石）［置换］（窥、偷桃）（见、吃桃）

张骞西王母汉武帝

（见、封侯）

2）伯三九一0　失调名[听唱张骞一新歌]九首：

张骞本自欲登仙。汉帝使遣上升天。今朝得遇西王母。驾鹤乘龙上紫烟。【〇一八四】

王母一见甚玲珑。花林玉树竞开红。比闻仙桃难可见。不期今日得相逢。【〇一八五】

张骞寻河值朦胧。正见药树在月中。鸡鸣三声在日里。独笑三声□虚空。【〇一八六】

阎浮太子传精进。欲往西园访花林。唤取鲁班刻车辇。唤取嵇康来抚琴。【〇一八七】

张骞寻河甚迟迟。正见织女在罗机。五百交梭一时动。五百钻头并相随。【〇一八八】

玉女恒在宝台坐。常共牵牛七月期。七月六日暂相见。七月七日即分离。【〇一八九】

织女身向内宫坐。拟共牵牛为夫妇。状似远道昔征辽。水深千丈而难渡。【〇一九〇】

张骞寻河放逍遥。正见织女摘仙桃。教儿何处觅船舰。织女啼哭苦号咷。

[①]【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403 页
[②]任半塘编着.《敦煌歌辞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34 页

【〇一九一】

织女啼哭莫号咷。谁能为汝造浮桥。寄语填河乌鹊鸟。年年为汝早填壕。

【〇一九二】[1]

任半塘先生在【〇一九〇】下注曰：“至此首以下三首内，原本有错行，有脱句，有严重讹字，不易校订。兹先照录原文原貌，并逐句编号如下，以便读者参详。按三首应有十二句，应占六行，而原文仅十一句，五行半，如下：

张骞寻河放逍遥，正见织女槁仙桃。
张骞身向内宫坐，共一牵牛为大妇。
状似远道昔征辽，水深千仞而难度。
交见河觅云般船，织女啼哭莫狍糟。
谁能为女造浮桥，寄语填河乌鹊鸟。
年年不为早怕■…………[2]

由于文献的缺损，如何确定这些歌辞都在《新合孝经皇帝感》这个文本中呢。任半塘先生解释道：“【〇一八五】辞中王母名称两见，‘仙桃’亦重见于【〇一九一】。足证王母织女等人物任在同一故事中。《汉武帝内传》曾云：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汉武帝阙廷。东方朔于朱雀窗中窥母。时母以桃七枚献帝。帝欲留核种之。母笑曰：‘此桃千年生花，千年结实。’指东方朔曰：‘此儿三偷桃矣！’歌中浪漫牵联，与织女传说同编成一则七夕故事，不为无因。”[3]

在《前汉刘家太子传》中是把织女置换为了西王母，但这篇却是另外一种构成形式：武帝派张骞寻河登山见王母，王母与武帝分桃，在星河徜徉中遇到了织女，织女向张骞诉苦，张骞以夫妇二人会乌鹊桥相见安慰织女，促成了二者姻缘。并且通读文辞，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文章完全没有了出使西域的功业，而转化为了将昆仑仙话的浪漫与民间普通民众生活完美结合的形式。

而织女又如何是与西王母产生联系的呢。文辞中我们见到“织女”“玉女”两词。经过任半塘先生考订，这里的织女和玉女必为同一人。[4]《汉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日正中，忽见有青鸟从西来。上问东方朔。朔对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有倾，王母至，乘紫车，玉女夹驭，有二青鸟如鸾，夹

[1]任半塘编着.《敦煌歌辞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27-628 页
[2]任半塘编着.《敦煌歌辞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32 页
[3]任半塘编着.《敦煌歌辞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30 页
[4]任半塘编着.《敦煌歌辞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3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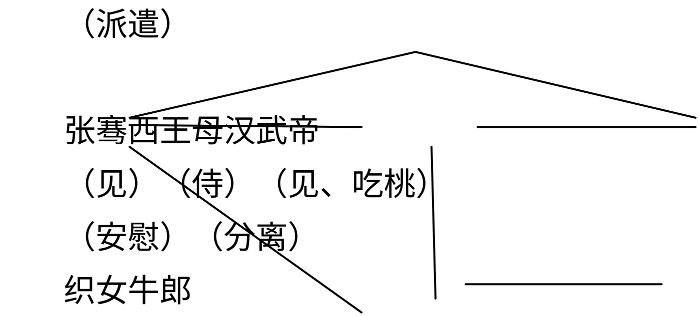
侍王母。”[①]则可以得出，作者将织女创作为了王母的侍女，张骞在昆仑天河先后见到王母与织女就没有矛盾了。

这些敦煌歌辞之所以非常重要，还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民间传说随时代变迁的直观形态。

首先，它丰富了传说故事的情节，尤为可贵的是出现了代言，如“织女啼哭莫号咷。谁能为汝造浮桥。寄语填河乌鹊鸟。年年为汝早填壕。”[②]则纯是张骞用语言来宽慰织女对丈夫的思念与忧虑。

其次，虽然这是一则神话故事，但却切切实实反映着普通人民的生活，表现他们的疾苦。从文本中织女的形象不再是不食烟火的神仙，而成为了一个丈夫行军在外，孤苦无依的普通妇女。歌辞中有“征辽”二字，使其充满了现实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曰：“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皆击匈奴。”[③]西汉时的右北平就是现在内蒙古西南、辽宁西、河北北部这一带；张骞出使的西域也远在边外。而隋末唐初亦有多次大型的征讨高丽战事。汉、隋唐的这两中战争其地域接近，使得民间将张骞天河遇只能一年一次与牛郎相会的织女传说与战争带来的夫妇离别甚至生死相隔联系起来。任半塘先生的意见非常具有启发性：“征辽乃初唐一件大事，予唐人印象甚深。因与寻河同为远征域外之举，故发联想为喻。”[④]可以说，传说故事是旧的，但是却在文本变化中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这个敦煌文本我们只能看见以上这些片段，那么就根据这些不完整信息来作图：



学者陶喻之查到浦起龙《读杜心解》语：“唐人多因宗懔有乘槎寻河源之说，误合为一。”推测这些张骞乘槎、入斗牛宫等传奇在唐代已相当盛行[⑤]。只是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①]任半塘编着.《敦煌歌辞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30 页
[②]任半塘编着.《敦煌歌辞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28 页
[③]【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30-2931 页
[④]任半塘编着.《敦煌歌辞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33 页
[⑤]陶喻之.《张骞乘槎故事源流考》.《民间文学论坛》.1989 年第 2 期.第 10 页

4.3 唐以后时期

从目前所能找到的文献看，唐以后张骞“穷河源”的传说并没有多少新变，所以就放在一起讨论。

4.3.1 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一方面宋朝前前后后一直受到辽、金、元的威胁，并且对西域也失去控制权，政府整体的对外政策都是较为保守，反映到文人和民众中就是思维的内向型。因而对于张骞的评价并不高。如王安石《飞雁》：“人生何必慕轻肥，辛苦将身到沙漠。汉时苏武与张骞,万里生还值偶然。”[①]文同《张骞冢祠》：“君不见武帝甘心事远略，靡坏财力由斯人。”[②]周紫芝曰：“博望侯乘槎而游，吾父子乘桴而浮，仲尼固厄穷于四海，而张骞又功名之流也。”[③]但宋人又重名节，对张骞的节气倒是表现出赞许。

另一方面，宋代文人好思考。故而对张骞乘槎之事是有理性辨证的。当然前文已经引过唐代赵璘就认为不足据。宋代人也有过一些论述。祝穆《古今事文类聚》载：

> 按张华《博物志》即无张骞之名，而《张骞传》又无乘槎之说，宗懔作《荆楚岁时记》未知何所据而云。[④]

陈元靓《岁时广记》曰：

> 按骞本传及《大宛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氐，为匈奴所留十余岁，得还。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氐、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并无乘槎至天河之谓。而宗懔乃傅会以为武帝张骞之事，又益以揞机石之说，《艺苑雌黄》云：今成都严眞观有一石呼为支机石，相传云汉君平留之。予宝历中下第还家，于京师道次逢官差递夫舁张骞槎，先在东都禁中，今准诏索有司取进不知眞何物也。[⑤]

又周密《癸辛杂识》曰：

[①]【宋】王安石撰，【宋】李壁注，李之亮补笺.《王荆公诗注补笺》.成都：巴蜀书社.2002 年.第 269 页
[②]【宋】文同.《丹渊集》丹渊集卷十三.四部丛刊景明汲古阁刊本
[③]【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四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④]【宋】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卷十一“天时部”.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宋】陈元靓 撰.岁时广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 年. 第 308 页

> 乘槎之事，自唐诸诗人以来，皆以为张骞，虽老杜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无处问张骞。”之句。按骞本传止曰汉使穷河源而已。张华《博物志》云……及梁宗懔作《荆楚岁时记》，乃言武帝使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见所谓织女牵牛。不知懔何所据而云。又王子年《拾遗记》云：尧时有巨槎浮于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月周天，名贯月槎，挂星槎，羽仙栖息其上。然则自尧时已有此槎矣。[①]

这段话给我们指出了魏晋人是将槎与仙人联系在一起的，故而张骞一乘槎就遇到了织女牵牛，这也是二者能合一的因素之一。

宋代经济非常繁荣，城市生活、娱乐项目丰富多彩，勾栏瓦子等遍布，因而文学尤其是故事性说书日益商品化并极速发展。我们推测有张骞出场的说书内容应该有所出现，但可惜的是这一时期的话本等几乎没有留存下来的。我们只能从文人的诗词作品中看到张骞传说的流传情况，如苏轼《鹊桥仙 · 乘槎归去》：

> 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沱汉漾。与君各赋一篇诗，留织女、鸳鸯机上。还将旧曲，重赓新韵，须信吾侪天放。人生何处不儿嬉，看乞巧、朱楼彩舫。[②]

李清照《行香子 · 七夕》：

>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色，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③]

从这些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骞乘槎的传说在宋代可能没有发展出独立的故事。但牛郎织女崇拜却很盛行，《梦粱录》记载有：“七月七日，谓之七夕节。其日晚晡时，倾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赏节序，又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遂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次乞巧于女、牛。”[④]张骞可能只是成为了民众喜闻乐见的牛郎织女传说故事的一个情节上所需要的配角。

[①]【宋】周密.《癸辛杂识》前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苏轼 著，邹同庆、王宗堂 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618 页
[③]【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32-33 页
[④]【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四.清学津讨原本

元代统治者较为推崇道教，自然而然对飞入了天河的张骞是有兴趣的。出现了很多“张骞乘槎图”和题诗，如魏初《为戴秀才题张骞乘槎图》：“一片枯槎物外仙，浪花如雪水如烟。只应直到天开处，冷笑闲横尽日船。”[①]尹廷高《张骞乘槎》：“仙槎正落斗牛间，散发中流意自闲。却被君平开口笑，水穷山尽不知还。”[②]道教人物陈义高《题张骞乘槎图》：“雪湧银涛八月秋，风吹巾袂兴悠悠。坐来蓬岛千年树，稳胜莲花一叶舟。星照横机问织女，月明清渚立牵牛。偶然得石归来后，却厌金章万户侯。”[③]

杂剧在元代的盛行也催生出了张骞有关的剧作，有王伯成的杂剧《张骞泛浮槎》，可惜已经遗失，无法看见。邓绍基先生根据他的另外一部作品《李太白贬夜郎》的描写推测这个剧作可能有神仙迎接张骞等情节[④]。

4.3.2 明清时期

明清时代，叙述性文学如小说杂剧传奇等发展迅速并最终成为这一时段的代表性文体。这里就列举一些例子。

明王莹所编《群书类编故事》载：

> 张华《博物志》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经月，而至一处。见城郭，如官府，室内有一女织，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问云：“此是何处？”答曰：“可问严君平。”[⑤]

这则流传的故事在前人的基础上增添了城郭、房室，使得场景更加生活化。

明代朱名世的《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开头就是张骞乘槎情节，我们截文如下：

> 按《天文志》：牵牛，天河西、之六星，一名河鼓，日以饭牛为事。汉时张骞溯河源，直至天河，见牛郎丰神俊伟，斋饭粮，持两具，牵牛至渚次求牧，与蒭……有时肱麾牛出，有时身跨牛归，有时经悬角读，有时手扣角歌……织女，天帝之女，一曰天孙，三星布象河东，织纫组紃为事者也。某年某月日，有人备粮，乘槎至一处所，见女人织机，问曰：“以何地？”女人遗石一片，曰：“可归问严君平便知端的。”其人携石归问君平，君平曰：

[①]杨镰 主编.《全元诗》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8页
[②]杨镰 主编.《全元诗》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页
[③]杨镰 主编.《全元诗》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7页
[④]邓绍基.《典实和传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张骞》.《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一期.第12页
[⑤]【明】王莹.《群书类编故事》卷一“天文类”.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 “此织女支机石也。从何得来？某年月日有客星犯斗牛，讵意之为子耶？”试问牛斗光景如何。其人答曰：“某彼时纵一所入凌万顷茫然，直至一清灵境界，森罗有象，万籁无声……”君平曰：“斗牛光景既闻。其梗既请问天孙织锦之事如何。”其人曰：谩说织锦且捋生质……其人曰：“天孙不事浓妆淡抹，自然国色天姿；不事翠袖云鬟，自尔花羞月闭……”[①]

在这篇小说中依然继承的是张骞之前的故事情节，但开头的这个对话就只成了引出牛女的引子了，没有了独立性。不过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故事的扩大：张骞所见的牛、女以及天河景象有了具体的描写，与严君平的对话也有了多个来回，同时增加了织锦情节。

明初瞿佑《剪灯新话》卷四有一篇文言小说《鉴湖夜泛记》非常有趣，由于其篇幅太长，我们这里只能截取相关片段：

> 处士成令言……常乘一叶小舟，不施篙橹，风帆浪揖，任其所之……初秋之夕，泊舟千秋观下，金凤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辉，水天一色……令言卧舟中，仰视天汉，如白练万丈，横亘于南北，纤云扫迹，一尘不起……舟忽自动，其行甚速，风水俱駃，一瞬千里，若有物引之者。令言莫测。须臾，至—处，寒气袭入，清光夺目，如玉田湛湛，琪花瑶草生其中，如银海洋洋，异兽神鱼泳其内。乌鸦群鸣，白榆乱植。令言度非人间，披衣而起，见珠宫岌然，宫阙高耸。有一仙娥，自内而出，被冰绡之衣，曳霜纨之帔，戴翠凤步摇之冠，蹑琼纹九章之履……至岸侧，谓令言曰：“处士来何迟？”令言拱而对曰：“仆晦迹江湖，忘形鱼鸟，素乏诚约，又昧平生，何以有来迟之问？”……乃请令言登岸……天章之殿。殿后有一高阁，题曰：灵光之阁。内设云母屏，铺玉华箪，四面皆水晶帘，以珊瑚钩挂之，通明如白昼。梁间悬香球二枚，兰麝之气，芬芳触鼻。请令言对席坐而语之曰：“卿识此地乎？即人世所谓天河，妾乃织女之神也。此去尘间，已八万余里矣。”令言离席而言曰：“……然未知尊神欲托以何事，授以何言？……”仙娥乃低首敛躬，端肃而致词曰：“妾乃天帝之孙，灵星之女，夙禀贞性，离群索居。岂意下土无知，愚民好诞，妄传秋夕之期，指作牵牛之配，致令清洁之操，受此污辱之名。开其源者，齐谐多诈之书；鼓其波者，楚俗不经之语；傅会其说而倡之者，柳宗元乞巧之文，铺账其事而和之者。张文潜七夕之咏。强词雄辩，无以自明；鄙语邪言，何所不至！往往形诸简牍，播于篇章，有曰：‘北斗佳人双泪流，眼穿肠断为牵牛。’又曰：‘莫言天上稀相见，犹胜人

[①]【明】朱名世.《牛郎织女传》.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1-12 页

间去不回！’有曰：‘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玄弄金梭。’又曰：‘时人下用穿针待，没得心情送巧来。’似此者不一而足，亵侮神灵。罔知忌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令言对曰：“鹊桥之会，牛渚之游，今听神言，审其妄矣。然如嫦娥月殿之奔，神女高唐之会，后土灵佑之事，湘灵冥会之诗，果有之乎，抑未然乎？”……引归其身，诞妄矫诬，名检扫地！后土之传，唐人不敢明斥则天之恶，故假此以讽之耳。世俗不识，便谓诚然……令言又问曰：“世俗之多诳，仙真之被诬，今听神言，知其伪矣。然如张骞之乘槎，君平之辨石，将信然欤？抑妄谈欤？”仙娥曰：“此事则诚然矣！夫博望侯乃金门宜吏，严先生乃玉府仙曹，暂谪人间，灵性具在，故能周游八极，辨识异物。岂常人之可比乎？卿非三生有缘，今夕亦乌得至此！”遂出瑞锦二端以赠之，曰：“卿可归矣，所托之事，幸勿相忘。”令盲拜辞登舟……取锦视之，与世间所织不甚相异，藏之箧笥，以待博物者辨之。后遇西域贾胡，试出示焉，抚玩移时，改容言曰：“此天上至宝，非人间物也。”……曰：“……其蚕盖扶桑之叶所饲，其丝则天河之水所濯，岂非织女机中之物乎？君何从得此？”令言秘之，不肯述其故……[①]

这篇小说有趣之处在于其结构的二重性。主人公夜泛到了天宫，遇见仙娥，仙娥就开始了对于人间将她配与牵牛，污了她的名节，并对于这些民间附会加以嘲谑，在其叙述中又讲述了张骞乘槎得石问严君平的故事，而自己则赠送给主人公瑞锦，而此为何物由西域商人解开谜题。我们小故事是张骞，大故事的处士成令言，但先后一个见房屋，一个见宫殿；一个是送支机石，一个是得瑞锦；最后都是从高人那里得知。其实我们可以说这只是玩了一个改主人公名技巧，其核心成分与以前的张骞乘槎故事一模一样。其次便是这篇文章文字，对于天河意境和宫阙的描绘极其优美，典故的运用典雅华丽。

明代杂剧方面有柳白屿的《乘槎记》，但亡佚了。

明代人对这个传说也有有非常睿智的判断。如康当世《康氏锦囊》曰：

张华《博物志》载：海上有人每年八月见槎来，不失期，遂赍粮，乘之而到天河。奈何作《荆楚岁时记》者遂以为张骞使西域事。[②]

陈全之《蓬窗日录》曰：

[①]【明】瞿佑等 著，周楞迦 校注.《剪灯新话（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98-101 页

[②]转引自 邓绍基.《典实和传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张骞》.《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一期.第 11 页

彼于文史间且用力如此，有志大儒为经学者，可草草乎？赋范蠡五湖而附以载西子事，赋秦长城而附以妇哭城崩事，赋汉四皓于商山而言围棊之事，皆无本源出处，特见唐人诗句中，而好事者又从而实之耳。张骞无乘槎事，乘槎乃海上客；毛宝无放龟事，放龟乃武昌军毛宝所统之人。而今例以张骞乘槎、毛宝放龟为言。噫！事类此失实者多矣。[①]

陈氏有卓识，举出若干事例，且指出附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唐人作诗喜欢将各个典故糅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论述很有启发意义。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我们发现南宋开始一直到清代，对张骞泛槎的地点的描绘几乎都是按照东边和南边海洋的景色加以描绘的。从外来说这是自宋元明以来对外的海上贸易的极度繁荣，使得人们在描绘异域之时不由自足地按照海洋的形态来描写。从文学的内部原因来说，西域天河的异域想象经过近千年的传承，其意象、意境也向符合传统的古典审美转向的必然结果。比如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将其日记题名为《星槎胜览》，清初诗人吴兆骞因为名中的“骞”，字曰汉槎等等。

清代，与张骞乘槎的各种艺术品广为流传。倪模《古今钱略》记载了专门的张骞乘槎的钱币：“张骞乘槎钱一面，为老干系葫卢，张骞乘其上游波浪。间一面为安石榴，形径二寸三分。”还有许多工艺品，举例如下：



（清代） 铜张骞乘槎摆件

[①]【明】陈全.《蓬窗日录》卷六事纪二.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



（清·康熙） 斗彩“张骞乘槎”图碗

清代秦嘉谟《月令粹編》也记载：

> 西汉张骞八月十三日乘舟游黄河，至暮，误汎入天河。见一女浣纱，骞问曰：“此何地也？”女人授一石与骞，谓曰：“汝归问成都卖卜严先生。”骞既归，持石问严君平，君平曰：“此织女支机石也。汝何得来？”骞告其故。君平曰：“我见彼月客星犯斗牛之间。”骞曰：“是矣正其时也。”[①]

虽然情节无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黄河”二字，这个故事说明至少在清代，人们已经将寻河认定为黄河。黄河在此时生态恶化，屡发灾害，因此在下面要讲到的清代杂剧中说张骞寻河源是为治理黄河便没有了突兀之感。

清代有三部关于张骞的杂剧：第一部是舒位《博望访星》，内容大概如下：

> 述汉武帝时，博望侯张骞奉旨探寻黄河源头，以图治理。时值七夕，牵牛织女鹊桥相会，张骞乘槎逆流而上到天河，向牛郎织女打听此事。双星借槎渡天河，牛郎为张骞指示河源，织女增之织锦支机石以为凭证，并告之往寻成都严君平便知就里。于是张骞乘槎顺流而归，前去复旨。[②]

在之前论述的敦煌歌辞中，张骞是作为安慰者存在，而这里变换成了这对恋人相会的帮助者。而给予支机石的情节在之前的故事中都没有出现原因，而舒位在这里加入了原因：答谢的馈礼，使得情节推动更加合理化。除石外还附送了织

[①]【清】秦嘉谟.《月令粹編》卷十三.清嘉庆十七年秦氏琳琅仙馆刻本

[②]王文章 主编.《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提要》.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196页

锦，明显是受上面所引的《鉴湖夜泛记》影响。而本戏曲还有一个亮点在于出使的目的转变了，不再是求佛求仙，而成为了为国为民，实实在在的事业。

道光年间文人李文瀚的《银汉槎》，内容大概是：

> 汉朝武帝时，雌鼍[①]率妖孽兴风作浪，致使山东水灾泛滥，黎民流离失所。张骞出使西域后得封博望侯，奉命前往治水，路遇富商卜氏。东海郡守汲黯，筹集粮饷救济灾民，卜氏出资二十万银两慷慨相助。张骞一路寻求河源，来至昆仑山下，忽见一道河流清且涟漪，经牧童指引，在织女处觅得支机石，并在炎帝之女精卫的协助下，将水妖与鼍王一一降伏。卜卦人严君平告诉张骞，所遇之人即为牵牛、织女。张骞将治水过程禀奏圣上，圣上不信，欲罢其官。幸得东方朔力保，才免被罢黜。为感牵牛、织女之恩，塑牵牛、织女、精卫、鼍妖之石像安置于昆明池上。牛郎安池东，织女安池西，精卫在高坡，鼍妖压水底，以示彰显。[②]

这个故事最大的特点就是运用双线结构，张骞为主线，汲黯为副线，而中间以卜氏作为连接点。其目的都是处理水灾，张骞杀妖解决根源问题，汲黯集粮解决现实问题，作者在其《凡例》中对此双线结构颇为满意：“水怪者,生民之仇也。水怪靖而生民自安,天然对待。故汲黯赈难即接以张骞叱怪,不谋而合、自然之理也。”[③]这个杂剧基本上综合了张骞乘槎最主流的情节元素。为了服务救灾主旨，我们终于看到了在天河经历的扩大，加入了精卫和镇妖的情节。古代人认为凡是发生水患都是江河湖海中有妖孽作祟（因而中国各地都有镇妖塔，故白蛇传传说中白蛇水漫金山寺还是需要雷峰塔来镇住她）。所以杀鼍情节就必不可少了。加入精卫，其原理还是上文所论述过的，精卫填海而旧传天河与海通，两者便有了糅合的契机。至于东方朔的保张骞官，也很好理解，毕竟史书上明确记载了张骞被罢过官后又得大行职务。这样变换罢官情节，大概是因为寄托了作者的父母官理想。对于救水患这个主题，学者严敦易认为：“用意似有所衬托影射，系以当时河患为隐喻，对于灾民之赈救，尤所关注，故特着一汲黯以表示之。”[④]而这部杂剧勾连得最巧妙之处在于其解释了武帝昆明池上的石像问题，使得张骞乘槎的大部分内容都有了因果逻辑关系。

蔡荣莲《支机石》，内容为：

[①]有学者认为这部杂剧是国家内忧外患下的产物，甚至认为“雌鼍”是影射英国女王。见路露.《李文瀚戏曲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4年.第115页

[②]王文章 主编.《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提要》.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243-244页

[③]转引自 路露.《李文瀚戏曲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4年.第115页

[④]王文章 主编.《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提要》.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244页

织女嫁牛郎后，懒理机杼。上帝令二人隔天河而居，惟七月七日命白鸟搭鹊桥，二人才可相见一次。上帝将上清洞府珍奇宝物支机石交与织女，令她将其放在织机旁。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张骞探河源误入天河，，织女将支机石相赠。回朝后，张骞被汉武帝封为会仙王，世袭罔替，保令名于后日，永笃忠贞。[①]

这篇故事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但从逻辑上来说解释了支机石的来源，这倒是创新点。

总之，通过对张骞乘槎相关故事的梳理，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演变及其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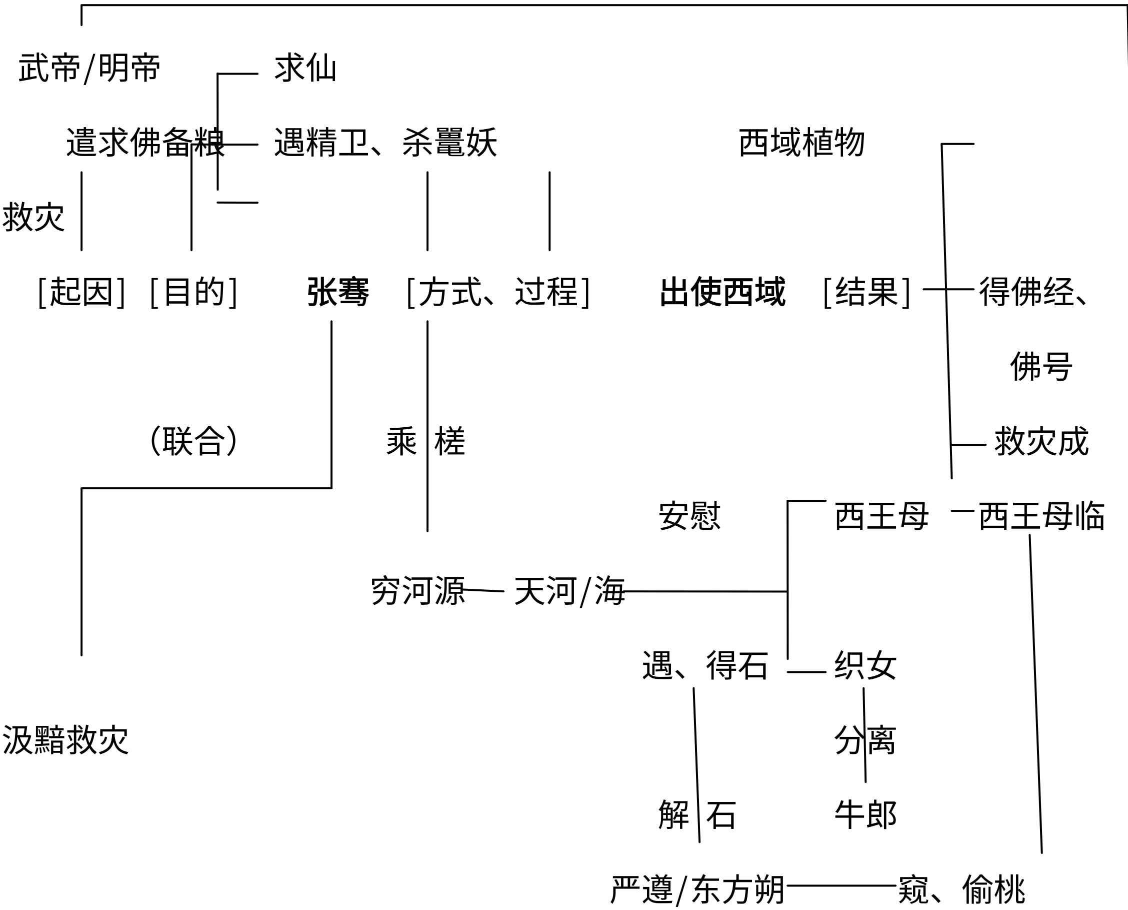
[①]王文章 主编.《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提要》.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245-246页

结论：演变模式与时代思潮

通过前面几章的对张骞各个传说的梳理与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一个传说故事是如何构成与演变的。这种变化既有文学内在的必然规律，也有外部的时代环境所施加的影响。张骞传说相对于如孟姜女、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流传极其广泛的故事来说，只能算作不温不火，处于中间广度。但这却恰恰给了我们一个较佳的对古代传说故事流传兴衰的研究视角, 通过张骞传说文本, 可以即清楚地看到传说是如何在虚构中丰富起来, 也可以窥见它无法发展为一个更大、更为完整的故事的缘由。

关于传说故事文本本身的变化形式，我们先来作一个完整的张骞传说图示：

见、吃桃



在第一章我提出了所有张骞的传说都是不断地增加“ 张骞出使西域。 ”这个简单句的成分来的。从上面这个结构图可以看到，这句话主要可以添加原因、目的、方式、结果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原因、目的由于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是被帝王派遣去进行具体的事：求法、求仙、救灾。而结果这一条，其演变形式

就是置换内容：引植物、得佛经、请王母、救灾成功，只能置换，没有扩展的空间。那么如果要依据这几条来丰富故事内容，就只能跃出“张骞出使西域”这个事件本身，在时间的延展上扩大内容，比如第四章所论证的《前汉刘家太子传》变文，张骞已经完成了任务即迎西王母完成，而想要增加内容，就必须添外部事件，因而才会有了东方朔偷看西王母和王母诉说他偷吃仙桃的趣事或者《银汉槎》中东方朔的保官。这**两件事是前后因果关系，时间链上的延长使得故事丰腴起来**。

只有方式过程这一栏可以有较大的发展，因为起因、结果都没有时间性，而出使**过程则有大跨度的时间以此来丰富内容**（如《西游记》的取经过程，创作者可以任意添加打斗妖魔鬼怪的情节而阻碍取经事业的完成）。而由于作为创作依据的《史记》拥有着“穷河源”三字，自然后世作者就会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但刚好这个“河”有了广为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两者融合在一起是很容易的。

但我们又要思考一个一个问题：为什么张骞“穷河源”的过程没有变化出除遇牵牛织女外的其他情节呢？（遇精卫、杀鼍妖其实是为结果赈灾服务而非出使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且这个情节也没有太大的时间拓展性，因为镇了妖后故事基本上已经就完结了）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牛郎织女故事在古代影响和传播太过广泛、深远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将其称之为“夺”，每一个传说故事都在想尽办法扩大自己的内容，且自身必须要保持主干地位。从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两个传说合在一起后的乘槎故事张骞还是主角，织女与严君平都是配角，为张骞而服务的。但是唐代开始，张骞的天河泛槎却成为了次要情节，如第四章的《新合孝经皇帝感》文辞可以看出其主要人物成为了织女，张骞起到的就是一个安慰作用，主流已经成为了七夕传说故事。由于传播的广泛，到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关于牛郎织女的文学作品，在其中，张骞乘槎遇织女的故事就只能成为它们的引子或者其中一个小小情节了——乘槎传说注定成了配角命运，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第二个原因，我们推测是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要虚构的话，必定会是以“闯关”形式进行，但叙事文学大力发展的元明清时期，同样是“闯关”为结构的《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张骞的西行所需的情节其他杂剧、小说等早已运用过了，自然就没有了丰富起来的可能性。可以看到在敦煌的壁画中，已经有了出使西域经过穷山恶水的险境描绘的萌芽了，但为什么却没有在后世发展开来？我们认为可能是它与僧侣西行求法雷同，本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积累了大量求经法师的游记，本来是有它发展的土壤的，但恰恰唐代出现了玄奘，与张骞相比，由于身份相同，路途相同，他更加符合这些材料内容，再加上玄奘西行又有众多有趣的佛经故事可以用来改编，自然也就没有张骞的份了。这里还要提的一点就是之前说过的，明清时期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运，航海的趣闻轶事

只能产生出《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游行类章回小说，而张骞是走陆路，这些轶事它是没法借用来的。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乘槎传说依旧在争扎着试图扩大——通过对天河的梦幻描写，但毕竟只是意境描绘，适用于抒情，没法拓展开来。

上面讨论了文本扩大的两种方式：故事外的时间轴上的叙述延展和传说故事内部可利用的时间内的情节丰富。但扩大文本内容还有第三种方式，那就是**共时性故事的联合**，从而形成叙述面上的广阔。最典型的就是上文介绍过的清代李文瀚的杂剧《银汉槎》，张骞泛槎与汲黯的开仓救灾没有任何因果上的联系，但正是由于他们都是同时代的人，因此将他们放在一个作品里，以表现整个面的武帝时期（这里是影射道光年间）的社会风貌。

其次，古代传说故事的糅合并不是随意的，它们有时也在文辞上有某些关联。从张骞传说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种方面的介质：

第一，**词义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中国古代文字由于其本身的单音节词占大多数这种性质决定了很多单个字必须承担若干以至几十个含义：在古代，字形与词义的不对等性。再加上古人行文喜欢省略以及语法的相对不严密，就很容易导致不同故事有了联系。比如第四章所论证的“河”“汉”即可理解为天上的银河，又可以使地上的河流，使得两个故事有了联系起来的契机。除开这个之外，不同时代人们对某词，由于时代的隔阂，造成了歧义性，如第三章中本为萨满信仰的“金人”，魏晋时人由于佛教的大盛而将其错误理解为了金佛像，进而与张骞传说有了时间上的关联。

第二，**传说故事中有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比如第四章中的“石”，成为了传说里所赠送的“石”，《史记·大宛列传》中的“多玉石”，昆明池中的牛郎织女石以及巴蜀地区崇拜的“支机石”全部勾连在一起的中介。

第三、**文本传抄过程中的讹误**。如第二章里所证明的，流传抄写过程中“汉使”添加上“张骞”，“大宛”改成“西域”等，进而带来的附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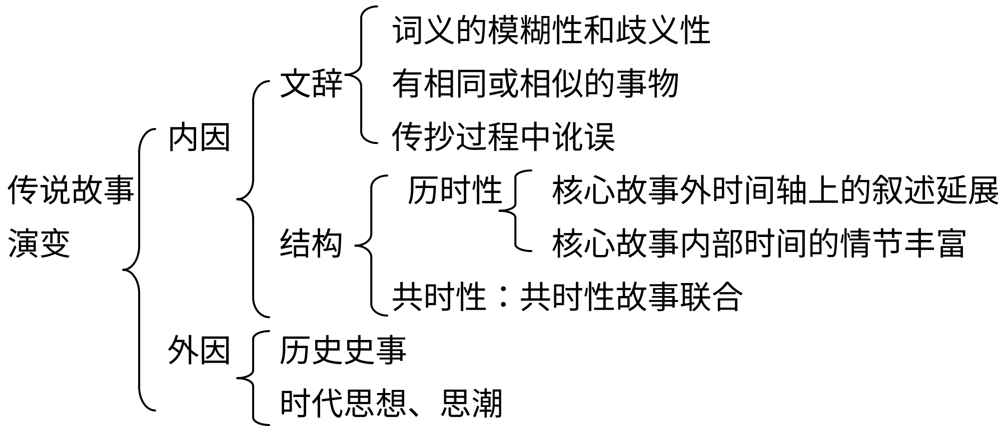
最后，时代思潮对于传说文本变异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再来根据前几章的内容列一张表：

时代	张骞传说内容或形式特点	史事、思想与思潮
汉魏晋南北朝	1、引进西域植物 2、西行求法 3、天河乘槎	1）中西交流滥觞时期 2）佛道、译经盛行 3）玄学、升仙思想、神鬼迷信之风
隋唐	1、出现变文、辞赋形式 2、有思征夫情节	1）诗赋取士 2）佛教文学大力发展 3）多边境战事
宋元	出现关于张骞的杂剧	市民叙事文学兴起

明清	1、出现环形、双线等叙事结构形式 2、有除妖救灾情节	1）叙事文学大盛、叙述技巧多样 2）晚清内忧外患、民众生活困苦

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我们可以知道一件故事虽然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藉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我们又可以知道，它变成的各种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单纯地随着说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随着说者的解释的要求的。我们更就这件故事的意义上回看过去，又可以明了它的各种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张的各种社会的需要。”[①]从上面这个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骞传说与时代背景、思想思潮的互动关系。**传说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其中所反映出的史事影响下的人民的情感、心态，及特定的思维、思想与艺术技巧却有着历史本质的真实。**

我们现在将上面的内容用一张图来总结：



虽然仅仅只是研究一个张骞的传说，并不能够使我们对中国古代传说故事流变模式与兴衰有全面的了解，但是它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具体的直观的启示，而这正是我们认为的张骞传说的价值所在。

[①]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顾颉刚全集·民俗论文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8页

参考文献

按作者名字以音序法排列

专著类

A—E

B

【东汉】班固 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

C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清】陈淏子撰.花镜[M].清刻本

【宋】陈景沂编.全芳备祖[M].明毛氏汲古阁钞本

【明】陈全.蓬窗日录[M].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陈寅恪集.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

陈寅恪.读书札记三集[M]. 陈寅恪集. 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

【宋】陈元靓撰.岁时广记[M].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 年

【清】陈元龙编.历代赋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 年

【清】陈元龙编.历代赋汇[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年

D

【唐】段公路纂.北户录[M].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 年

F—J

F

【南朝宋】范晔 撰.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

【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

G

【晋】干宝 撰.搜神记[M].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 年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 · 民俗论文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

H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日】鹤间和幸著，马彪 译.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M].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03.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4 年

【汉】桓宽 撰，王利器 校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
【宋】洪遵 撰.泉志[M].明万历刻秘册汇函本
【南朝梁】慧皎 撰，汤用彤 校注，汤一介 整理.高僧传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
J
【北魏】贾思勰 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年
季羡林.佛教十五题[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

K—O

L
【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M].商务印书馆.2001 年
【宋】李昉等 编.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年
【宋】李清照 著，徐培均 笺注.李清照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明】李时珍 著.本草纲目（点校本）[M].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 年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年
【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
【唐】刘知几 撰,【清】浦起龙 通释,王煦华 整理.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晋】陆机.陆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商务印书馆.2011 年
M
【法】马伯乐 著，冯承钧等 译.马伯乐汉学论著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O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P—T

P
【清】彭定求编.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
Q
【明】瞿佑等 著，周楞迦 校注.剪灯新话（外二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R
任半塘编著.敦煌歌辞总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南朝梁】任昉撰.述异记[M].明汉魏丛书本
S
【日】桑原隲藏 著，杨炼 译.张骞西征考[M].商务印书馆.1934年
【明】慎懋官撰.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M].明万历九年刻本
【晋】释法显 撰，章巽 校注.法显传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西汉】司马迁 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西汉】司马迁 撰，【日】泷川资言 考证，杨海峥 整理.史记会注考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T
【宋】唐慎微撰.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M].四部丛刊景金泰和晦明轩本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宋】 苏轼 著，邹同庆、王宗堂 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U—Z

W
【宋】王安石撰，【宋】李壁注，李之亮补笺.王荆公诗注补笺[M].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
王明珂.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7年
【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
【宋】王钦若等 编纂，周勋初等 校订.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
王叔岷.史记斠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明】王莹.群书类编故事[M].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清】王先谦撰.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王文章 主编.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提要[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
【北齐】魏收 撰.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唐】魏徵等 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宋】文同.丹渊集[M].四部丛刊景明汲古阁刊本
【清】吴玉搢着.别雅[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吴自牧.梦梁录.清学津讨原本

【宋】文莹 撰，郑世刚 杨立扬 点校.湘山野录 续录 玉壶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X
【荷】许理和 著. 李四龙 译.佛教征服中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
Y
杨镰 主编.全元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杨宪益.译余偶拾[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清】叶昌炽 著.奇觚庼文集[M].民国十年刻本
【汉魏】佚名，【清】毕沅校正.三辅黄图[M].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
【魏晋】佚名 撰.三辅故事[M]. 龙谿精舍丛书
【南北朝】佚名.灵宝五符经[M].明正统道藏本
余嘉锡 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 整理.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Z
【东汉】张衡著，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晋】张华 撰，范宁 校证.博物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唐】赵璘撰.因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清】赵翼 撰，王树民 校证 .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
【东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新编金匮要略方论[M].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40年
【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 1995年
【宋】周密.癸辛杂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民族与社会变二）[C].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明】朱名世.牛郎织女传[M].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宋】祝穆.事文类聚[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论文期刊类

陈兴佳.石榴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D].山东农业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4年
邓绍基.典实和传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张骞[J].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一期
黄剑华.古代蜀人的大石崇拜[N].成都日报.2009年12月28日
梁中效.汉水流域文化与牛郎织女星神[J].安康学院学报.2013年8月第25卷第4期
李平、孙杰、邢建军.论苜蓿的起源与传播[J].内蒙古草业.2012年第1期

李荣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张骞形象考述[J]. 中华文化论坛. 2014 年 02 期
路露.李文瀚戏曲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4 年
芮传明.葡萄与葡萄酒传入中国考[J].史林. 1991 年 03 期
沙武田.角色转换与历史记忆——莫高窟第 323 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艺术史意义[J].敦煌研究.2014 年.第 1 期
孙琪.张骞典故的变迁与晚明文人眼中的传教士形象——以<熙朝崇正集>中艾儒略形象为例[J].文化论苑.2010 年总第 436 期
孙修身.从“ 张骞出使西域 图 ” 谈佛教的东渐[J].敦煌学辑刊.1981 年
陶喻之.张骞乘槎故事源流考[J]. 民间文学论坛.1989 年第 2 期
陶喻之.“ 张骞泛槎 ” 典故唐代接受史[N].东方早报.2014 年 10 月 22 日
阴法鲁.中国古代音乐史料杂记三则[J].音乐研究.1988 年.第 1 期
袁祖雨.“ 张骞通西域 ”汉代画像石考辩[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2 卷第 7 期 2013 年 7 月
于洁.宋元人心目中张骞形象及其历史渊源[J]. 中原文化研究. 2014 年 01 期
张振新.谈莫高窟初唐壁画“ 张骞出使西域“ [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 年第 3 期
周妍、任继昉.“ 张骞乘槎 ” 典故研究[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4 年 05 期

致谢

狮山的读研时光转瞬即逝，离毕业也不远了。塞缪尔 · 厄尔曼说：“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回首这三年，虽没有什么成就，但以自己的愚资，趁着大好年华，能有所努力而进步，还是窃喜的，庆幸自己仍然“ 在路上 ”。读研期间，既有了大量阅览古人之作的时间与机会，但遗憾于自己阅读能力有限以及时代隔阂，仅只能一知半解，未能切身体会古贤的精神与气度，虽 “ 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在年轻时候不断丰富自己的阅历和享受读书所带来的这份精神富足，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敢肯定，多年以后，在暖日懒照于书、桌之处，总会追忆起这段似水年华。O ever youthful,O ever weeping!

感谢我的导师段渝老师。读研期间，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上给了我莫大的启迪与帮助：从研一开学的必读书推荐到最后毕业论文写作中的答疑解惑，段老师都对我及时指导。无论自己提出多么幼稚的问题和想法，段老师总是报以肯定、鼓励的态度，给了我极大的自信。下课后与老师一起在校园里闲庭信步，浸淫于学术讨论之中的时光永远会珍藏在心中。祝愿老师与师母健康快乐！

感谢文学院熊良智老师、李大明老师、李诚老师、赵义山老师、汪燕岗老师、房锐老师，王红霞老师、蒋俊老师、李苑静老师等老师，以及巴蜀研究中心的邹一清老师、颜信师兄、李竞恒师兄对我学业上的无私帮助。祝各位老师及家人幸福安康！

感谢两古专业同学以及其他学校里的朋友在读研期间一起的愉快玩耍。谢谢有你们的陪伴。Stand by Me。祝各位同学、朋友都有一个好的前程！